

学校代码 :14596
分 类 号 : C

学号 :S2021107018
密级 : 无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未竟的转型：女性主义视域下 主流媒体网站的母职建构

刘港平

导师姓名及职称： 孟威 研究员

院 系： 新闻传播学院

专业学位类别： 新闻学

专 业 方 向： 网络新媒体传播

评 阅 人： 匿名评阅

答辩委员会： 钱莲生、秦汉、张满丽、杨斌艳

答 辩 日 期： 2024 年 5 月 8 日

2024 年 3 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
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和版权使用授权书

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作品成果。对本论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人完全意识到本声明的法律结果由本人承担。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刘港平 2024年5月20日

版权使用授权书

本人授权：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有权保留本论文，包括印刷本和电子版本；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他复制手段保存本论文；学校可因学科评估、学位论文质量抽检、优秀学位论文评选等事宜，向有关机构提供本论文；可非营利性公开本论文内容；可非营利性查询或阅览本论文。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刘港平

2024年5月20日

指导教师签名：王威

2024年5月20日

摘要

基于当下适龄群体低迷的生育意愿和妇女权益保障事业，本文以女性主义母职理论为基础，综合运用文本挖掘和批判性话语分析的研究方法，试图分析主流媒体网站的母职建构及其性别观念的水位，进而探究性别平等和性别分工的议题。研究表明，以“人民网”为代表的主流媒体网站通过隐喻、框架建构、互文性、名词化等表达技巧，建构了作为文化意象的“自然母职”和“社会母职”，以及作为生育主体的“神圣母职”和“科学母职”。

首先，媒体沿用传统的文化意象和报道框架，在“母亲河”和“英雄”的叙事中，加深了“自然母职”和“文化父职”的区隔，进而延续了母亲作为天然照顾者、父亲作为民族英雄和引领者的角色定位。其次，在公共领域，借助“爱心妈妈”“环保妈妈”等称呼，女性公民精神的生长被转译为性别分工的强化，而通过将照护者的身份分配给女性，相关机构参与了母性标准的塑造，与此同时，公共服务的部分成本也通过无酬劳动单一地转移到了女性身上。再次，在生命政治下，传统话语、科学话语、政策话语和媒体话语，借助主流媒体网站这一场域，协同生产了具有偏向性的人口知识。一方面，“女性做母亲是自然的”“母亲角色带来幸福”等迷思的复现，使得女性无法真正行使不生育的自由。另一方面，对于生育知识的选择性报道，强化了女性基于生育无知的“神圣母职”和失去身体自主性的“科学母职”，也使得女性真实的生命体验让位于文化与科学的话语建构。最后，以打造生育友好型社会为目标的政策调整，虽然出于美好的愿景，但是因为缺乏对妇女经验的理解，也受限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就其结果来看，存在加剧性别隔离、强化母亲使命的倾向。综合来看，当前主流媒体网站的性别意识仍有不足，存在对于性别分工、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

基于费尔克拉夫的三重分析框架，本文讨论了文本、话语及社会实践之间的关联，指出，主流媒体网站的报道策略和话语生产都受限于社会结构和规范的影响，包括传统文化、大政方针、生产力发展水平等，又反映和巩固了性别不平等的社会秩序。而父权制下高度道德化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又以公共领域、家庭领域、经济市场分工的形式具象体现，从而再生产了女性的弱势地位。

本文认为，尽管社会性别观念和体制机制取得了进步，但是，妇女权益保障的进程仍然充满挑战。当前的生育政策需要导向良性的生产关系，将社会生产和社会再生产，也就是经济活动和育儿行为整合为单一的过程，破除家庭、职场、公共事业方面的性别分工。此外，经济学的研究也表明，新的经济增长依托于人口的质量而非数量，因而，面对女性的主体性与社会发展目标的冲突，政策的设计也亟需拓展对未来的想象力，在修正对“理想工人”和“理性母亲”认知的同时，探寻刺激生育之外的发展路径。

关键词：母职建构；女性主义；主流媒体网站；话语分析；性别分工

ABSTRACT

In light of the diminished fertility intentions among young people and the cause of protecting women's rights and interests, this paper delves into the portrayal of motherhood within the mainstream media website, drawing upon feminist motherhood theory and employing methodologies such as data mining an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is investigation aims to unearth underlying narratives on gender equality and labor division. The analysis reveals that entities like People's Daily have nuanced the depiction of motherhood, delineating "natural" and "social" facets of motherhood, alongside "divine" and "scientific" perspectives on reproductive roles, through sophisticated use of metaphor, framing, intertextuality, and nominalization.

Initially, the study observes that media narratives, through traditional motifs of the "Mother River" and "heroes," deepen the dichotomy between "natural motherhood" and "cultural fatherhood," perpetuating conventional roles that see mothers as inherent nurturers and fathers as societal leaders. Furthermore, it highlights how the public sphere's celebration of "caring mothers" and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mothers" translates female civic engagement into a reinforcement of gendered labor divisions, with societal institutions shaping maternity standards and inadvertently shifting public service burdens onto women through unpaid labor. Additionally, the discourse on population politics, shaped by an amalgam of traditional, scientific, and policy narratives, manufactures a biased understanding of demographics. It resurrects myths that restrict women's reproductive autonomy and advances a selective narrative on reproductive knowledge, sidelining women's real-life experiences for cultural and scientific constructs. Policy efforts aimed at fostering a birth-friendly society, despite noble intentions, inadvertently magnify gender segregation and reinforce traditional maternity roles, due to an insufficient grasp of women's experiences and societal productive capacity constraints.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current gender consciousness of the mainstream media website still harbors deficiencies, perpetuating stereotypes regarding gender roles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r. Drawing on Fairclough's tripartite framework, it links textual, discursive, and social practices, suggesting that media's reporting strategies and discourse production are inherently constrained by social structures, norms, and the prevailing level of productive forces, thereby mirroring and entrenching the

gender inequality embedded in the societal order. This perpetuation of patriarchy's moralized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values manifests through divisions of labor across public, domestic, and economic spheres, thus reproducing women's subordinate positioning.

Despite societal advancements in gender perceptions and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the journey toward genuine women's emancipation remains fraught with challenges. The paper advocates for reproductive policies that foster beneficial productive relations, integrating economic activities and child-rearing into a cohesive process to dismantle entrenched gendered labor divisions. Moreover, it underscores that economic growth now hinges more on population quality than quantity, necessitating policy frameworks that reconcile women's agency with societal development goals through innovative future-oriented strategies and diversifying beyond a narrow focus on stimulating fertility.

KEY WORDS:

Construction of Motherhood; Feminism; Mainstream Media Website; Discourse Analysis; Gender Division of Labor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意义	1
一、人口问题与低生育意愿	1
二、妇女权益与性别不平等	2
三、主流媒体网站对生育议题的回应	5
第二节 文献综述	5
一、媒介与女性研究的缘起	5
二、女性主义母职理论	7
三、媒介的母职建构	11
四、主流媒体矩阵的母职议题	14
第三节 研究设计	15
一、研究对象	15
二、研究问题	16
三、研究方法	17
第二章 作为文化意象的母亲	19
第一节 “自然母亲”的隐喻与天然母职	19
一、人类中心主义与父权制的同构	19
二、自然母职与文化父职的区隔	21
第二节 “社会母职”的赞誉与性别气质	22
一、“爱心妈妈”：女性的社会母职	22
二、“环保妈妈”：被淡化的公民精神	24
第三节 性别失衡的社区服务和无酬劳动	25
一、社区服务：对母性的推崇与维持	26
二、无酬劳动：对家务劳动的延续	27
第三章 作为生育主体的母亲	29
第一节 生育自由与生命政治	29
一、生命政治与被管理的女性身体	29
二、生育自由与不做母亲的权利	31
三、人口知识与科学的政治化	33
第二节 “神圣母职”与被掩盖的女性主体	35
一、“幸福母亲”与生育无知	35
二、科学母职与哺乳化的身体	38
第三节 生育政策与社会分工的性别隔离	41
一、生育政策需导向良性的生产关系	41
二、性别化的政策加剧性别隔离	42
第四章 结语	43
第一节 主流媒体网站建构的四重母职	43
第二节 女性困境的三重框架	45
第三节 研究不足与展望	46
参考文献	48
致 谢	60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意义

一、人口问题与低生育意愿

人口结构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2 年我国全年出生的人口为 956 万人,出生率为 6.77‰,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为-0.60‰^①。这标志着我国正式进入了人口负增长的时代。相较之下,2023 年,我国全年出生人口为 902 万人,人口出生率进一步下降至 6.39‰^②。国家卫健委指出,预计在 2035 年左右,我国会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会超过 30%^③。这就意味着,中国将会面临和发达国家一样的人口困境,比如年轻劳动力不足、社会保障和财政压力激增、医疗资源紧张、经济增速放缓甚至是衰退等。此外,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面临的独特国情是:人口规模巨大、经济发展还很不均衡,部分地区将会陷入严重的“未富先老”的危机。

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中国政府相继于 2013 年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于 2015 年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并于 2021 年推出“三孩生育”政策。虽然生育政策的整体性转向给予了民众更多的选择空间,但是,统计数据显示,现行政策只在短期内释放了部分民众累积的生育意愿,尤其是对二胎或三胎生育男孩的偏好,却未能有效刺激人口的长期增长,而且从全国范围来看,民众的生育意愿有进一步下降的风险。

除了生育观念转变、生活压力较大、育儿成本激增等因素,有关研究指出,在男性占据优势的传统婚姻模式下,男性的生育意愿会明显高于女性,而随着生育政策日益放松,这种生育意愿的性别差异越来越大^④。另有研究指出,女性的社会地位越高,在生育决策方面的话语权越大,则其生育子女的数量就越少,其中用以衡量女性社会地位的指标主要包括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家庭决策权、流动范围、职业类型等^⑤。关于后者,需要明确的是,这类研究只反映了在特定的社会阶段,女性的生育意愿和社会地位之间基于数量的相关关系,并不能解释其中的因果。一个可能更合理的推论是,生育意愿的性别差异和女性生育意愿的持续走低恰恰反映出,在父权制之下,女性承担了更沉重的生育代价,因而,当一个女性通过教育、就业、社会流动等途径,对自身处境有了更清晰的认知,并且拥有自主选择权时,她们便会放弃生育这一或许“并不愉快”的生命体验,转而去寻求其他的人生价值。换言之,从性别的视角来看,除了两性共同面临的困境,低生育率在部分程度上是女

① 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

报》,http://www.stats.gov.cn/sj/zxfb/202302/t20230228_1919011.html,2023 年 2 月 28 日。

② 国家统计局:《2023 年国民经济回升向好 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

进》,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401/t20240117_1946624.html,2023 年 1 月 17 日。

③ 央视网:《国家卫健委:2035 年左右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破 4 亿 占比将超

30%》,https://news.cctv.com/2022/09/20/ARTInjejqDvmMaZi5jzTPHYT220920.shtml,2022 年 9 月 20 日。

④ 石智雷、郑州丽:《性别视角下生育意愿研究》,《财贸研究》,2023 年第 6 期,第 9-20 页。

⑤ 石智雷、杨雨萱:《女性权益、社会地位与生育选择:相关文献评述》,《人口学刊》,2019 年第 1 期,第 31-44 页。

性的生育代价与其从既有的社会结构中获得的资源并不匹配的结果。

从文明演化的理论视角来看，女性的社会地位提高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也是我国妇女保障事业取得重大成果的体现。在现有的政治文明之下，没有任何理由去限制女性接受高等教育或者平等参与职场竞争的机会。而从社会发展的现实角度来看，生育意愿的下降并非是不可逆的，如前文所述，生育率下降的部分原因在于女性的觉醒，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性别平等的实现，如果女性认知与境遇的天平能够再次达到平衡，那么，生育率便会触底反弹，呈现出先下降而后略微上升的“反J型”关系^①。

当前，就国家治理而言，超低生育率的破局之道在于进一步消除不合理的性别分工、促进公私领域的性别平等，从而缩短总和生育率从“下降”到“反弹”的中间阶段。具体而言，就是使得女性承担更低的生育代价，获得足够的育儿支持，并且在生育前后拥有与男性相同的发展机会，摆脱在社会生产中的边缘状态和从属地位。相关研究表明，职场发展前景、生育以后社会地位的变化以及相应的社会福利保障，对于职业女性的生育意愿有显著的影响^②。欧美国家的经验也表明，生育政策有效与否，关键在于它能否促进女性的就业，能否推动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平等^③。而从近年的政府文件来看，在全局性或地方性的生育政策设计中，相关措施也强调要充分保障女性就业的合法权益，发展具有普惠性的托育服务体系^④，进而打造一个“生育友好型社会”。

但是，美好的政策愿景并不意味着圆满的社会效果。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来看，生育政策最终能否顺利实施，且在细则上不走样、变形，这依赖于社会整体性别观念的进步。此外，上野千鹤子指出，如果劳动政策仍然预设“生育是女人的事情”，推动育儿公共化也只是为了“减轻女性负担”的动员政策，那么就无法真正实现两性的平等^⑤。相反，只有将育儿视为两性和社会共同的事情，并且基于这种信念去重构相关的社会文化、制度安排和劳动分工，破除生育代价和社会资源在两性之间分配不均的结构性顽疾，才有可能迎来一个性别平等的“生育友好型社会”。因为无论是女性的家庭地位还是职业发展问题，都不仅仅是“减轻女性负担”就可以解决的，从根本上来看，这关系到整个社会如何认知女性的价值和定位。

二、妇女权益与性别不平等

前文用较长的篇幅从生育意愿的角度论述了其于性别平等的关系。需要说明的是，虽然从理论和经验来看，促进性别平等能够提高生育意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促进性别平

① 蒙克：《“就业—生育”关系转变和双薪型家庭政策的兴起——从发达国家经验看我国“二孩”时代家庭政策》，《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5期，第218-241+246页。

② 蒋莱：《职业女性的生育二孩意愿——以上海市HP区楼宇就职女性为对象》，《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第49-56页。

③ 房莉杰、陈慧玲：《平衡工作与家庭：家庭生育支持政策的国际比较》，《人口学刊》，2021年第2期，第86-97页。

④ 新华社：《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https://www.gov.cn/zhengce/2021-07/20/content_5626190.htm，2021年7月20日。

⑤ [日]上野千鹤子著：《父权制与资本主义》，邹韵、薛梅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3页。

等的目的就在于提高生育率。平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原则，妇女权益更是基本的人权，因而性别平等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议题，自成目的，它绝非实现其他政治或经济目的的手段。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坚持男女平等是我国的基本国策，要推动妇女平等参与经济社会发展，并且平等地享有改革成果^①。

近年来，我国在保障妇女权益方面做出了持续的努力，女性的社会地位也有了显著的提升，但是就其完善程度而言尚有不足。新冠疫情更是进一步拉大了两性的收入差异，女性面对的职场歧视、照料惩罚和心理健康问题进一步加深^②。

《2023 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Global Gender Gap Report 2023）显示，在囊括了 146 个国家的全球性别平等指数排行榜中，中国位列第 107 位，相较于 2022 年排名降低了 5 位；在教育程度方面得分为 0.935（总分为 1.0），位列第 123 位，在高等教育方面则实现了完全的性别对等，位列第一；在经济参与和机会方面得分为 0.727，位列第 45 位，相较于 2022 年，该项得分下降了 0.014，排名下降了 8 位^③。该报告由“世界经济论坛”发布，这是一个国际性的非营利组织，其权威性广受认可，自 2006 年起，该组织迄今为止已经发布了 17 次《全球性别差距报告》。

虽然这些数据有其特定的构成指标和作为支撑的西式价值观念，且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国内的发展情形极不均衡，如果更换一种测量方式，或许得分和排名会有所不同。但是该报告至少能够部分说明，国内女性地位的提升，更多意味着其生存境遇在历史维度上的相对改善，而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在实现性别平等的道路上依然任重道远。此外，中国在经济（0.727）和教育（0.935）方面的得分差异也表明^④，虽然此前的独生子女政策以及全社会对知识的推崇，使得女性有更多机会获得与男性相同的教育资源，但是，当她们离开校园以后，却在劳动参与率、同工同酬和预估收入方面，处于明显的劣势。相关数据一方面印证了前文关于女性的认知水平、受教育水平与其经济地位、生存境遇不相匹配的观点；另一方面，也引导人们去思考：究竟是什么因素造成了其中的差异？答案直指性别解放的不彻底和性别分工的传统秩序。

回顾近代历史，可以发现，“性别”和“阶级”一样，都是作为一种新思想传入中国的，而“去除性别等级”也就和“消灭阶级剥削”一样，成为了中国追求现代性和社会正义的目标^⑤。在民族危亡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自诞生之日起便与民族国家的建构紧密相连，可以说，正是民族革命开启了中国妇女运动的政治空间^⑥。

① 求是网：《习近平：保障妇女权益必须上升为国家意志》，http://www.qstheory.cn/laigao/ycjx/2022-06/22/c_1128765281.htm, 2022 年 6 月 22 日。

② 澎湃思想市场：《疫论·性别 | 降薪失业、以性换租、照料惩罚：疫情下的全球女性贫困》，2021 年 2 月 3 日，<https://mp.weixin.qq.com/s/xivM76tYoXY480QhBURajQ>

③④ World Economic Forum: “Global Gender Gap Report 2022”, <https://cn.weforum.org/reports/global-gender-gap-report-2023>, 2023.6.20.

⑤ 宋少鹏、高夏薇：《境况性知识、内在历史的视域：回看中国百年妇女运动的历史与经验》，《开放时代》，2022 年第 6 期，第 32-53+5-6 页。

⑥ 宋少鹏：《民族国家观念的建构与女性个体国民身份确立之间的关系》，《妇女研究论丛》，2005 年第 6 期，第 50-56 页。

但是,自维新变法以来,以国家为本位的妇女解放运动,客观上也使得对于国家整体利益的追求长期遮蔽了女性利益的话语空间^①。“同为国民,同担责任”的救亡话语虽然建构了两性平等的“国民”身份^②,在教育普及、参政议政、革命运动方面为女性赋权,但是对于父权、夫权的反思却不足。而以男性为主体的革命队伍,也往往会有意无意地忽视妇女在婚姻家庭、角色分工中的特殊境遇和不利地位^③。贺桂梅在反思“延安道路”中的性别问题时提出,1943年实行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将促进妇女参与经济生产作为首要任务和唯一的衡量标准,而当时的生产模式又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作坊式生产,这就使得革命工作竭力寻求与乡村伦理的协调,其结果是固化了传统的父权制的家庭结构^④。

建国之初,计划经济体制延续了国家本位的意识形态,虽然法律赋予女性和男性相同的权利,鼓励女性平等地参与社会主义建设,却仍然保留了女性照料家庭的角色^⑤。虽然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国家建设起了公共托育体系,但是这一系列福利制度的目的,更多在于解放作为劳动力的女性,而非作为“贤妻良母”的女性。其结果是,在高度国家化的性别叙事中,“男女平等”实则 是以男性为标准的平等^⑥,这就导致女性的独特经历、需求和视角往往被忽视或边缘化。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公共托育制度的瓦解,这种性别解放的不彻底性又使得女性因为育儿的家庭化和性别分工承担了内外兼顾的双重任务,进而沦为市场中的“劣质”劳动力,忍受着经济上的分配不公和文化上的否定贬低^⑦。上野千鹤子更是犀利地指出,近代工业社会中性别歧视的根源就在于“市场”和“家庭”,也就是公私领域的分割,而后者往往会被划归为本能^⑧。如果不能破除这种二元对立视野下的经济分割和文化偏见,那么性别平等便只能停留在口号和程序层面,无法实现事实上的公正。

社会主义道德弘扬集体主义精神,强调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有机统一,这种辩证关系意味着,集体主义所要求的个人牺牲并非是无条件的、绝对的,社会的发展也不应当以牺牲特定性别、特定群体的正当权益为代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审视女性的处境、调整其社会定位和利益所得便至关重要。

① 宋少鹏:《民族国家观念的建构与女性个体国民身份确立之间的关系》,《妇女研究论丛》,2005年第6期,第50-56页。

② 宋少鹏:《赋予五四运动以社会性别:女学生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第60-66+158页。

③ 张文灿:《妇女性别解放与阶级、社会解放的互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妇女解放运动的政策及效果》,《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第105-108页。

④ 贺桂梅:《女性文学与性别政治的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03-109页。

⑤ 刘志玲:《从政治解放到自我解放——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历程的研究》,《前沿》,2007年第1期,第234-237页。

⑥ 刘利群:《可见与不可见——社会性别视角下的中国媒介与女性》,《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第35-38页。

⑦ 宋少鹏:《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妇女——为什么中国需要重建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批判》,《开放时代》,2012年第12期,第98-112页。

⑧ [日]上野千鹤子著:《父权制与资本主义》,邹韵、薛梅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4页。

三、主流媒体网站对生育议题的回应

如前所述，包括育儿在内的公私领域的性别分工固化了父权制下的性别秩序，而这又抑制了女性的生育意愿，部分程度上加剧了当下的人口危机。无论是从政府治理和国家利益的角度，还是从妇女权益保护和性别平等的角度出发，都有必要重新审视社会在育儿（包括生育、养育、教育等）问题上的性别观念和政策实施，而主流媒体网站正是社会观念、地方或中央政策发布的重要载体。作为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近年来，主流媒体网站愈加关注适龄群体的生育意愿，积极进行政策解读和舆论引导，也逐步意识到生育与性别平等的复杂关系。既有研究显示，媒体作为信息中介呈现了生育政策的变化，也与多维因素合力生产文化资本，推动女性生育观念的转变^①。

基于人口问题和性别平等两大议题，本文关注的是：当下中国主流媒体网站性别观念的水位究竟如何，与育儿相关的舆论引导是否符合性别平等的理念？

由于当前主流媒体的公信力和引导力下降，从社交媒体来看，用户往往会对主流媒体矩阵的文本进行对立式的解读或者采取新闻回避的态度，因而研究主流媒体网站是否“有价值”“有代表性”便颇受争议。需要明确的是，“魔弹论”的神话早已成为过去式，如今，媒体是作为中介而存在的，和传播效果同样重要的是：哪些主体（who）运用何种方式（how）利用媒体，又发出了怎样的声音（what）。

具体到本文关注的议题，首先，在性别问题上，社交媒体的对立与冲突愈演愈烈，考虑到社会分层、代际差异，可以说，主流媒体反映的仍是中国近代以来民众性别观念演变至今的最大公约数。其次，在中国，主流媒体代表的是政府的声音，在推动生育政策落地的过程中，它清晰反映了国家政策的整体走向。这些都是流量逻辑和商业媒体无法撼动的。因此，本文认为，借助主流媒体网站的新闻文本能够将“性别观念”和“育儿引导”具象化，具有相应的研究价值。

为了使研究脉络更加清晰、研究对象更为聚焦，本文拟选择与此密切相关且更为具体的“母职”作为切入点，试图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出发，考察在“三孩政策”之下，主流媒体网站建构了怎样的母职，这种母职建构是否符合性别平等的理念？借助主流媒体网站中呈现的母亲定位、养育行为、育儿观念、政策导向、性别差异等，我们可以评估其在性别平等问题上的表现，并为相应的媒体报道、政策发布乃至社会转型提供参考。

第二节 文献综述

一、媒介与女性研究的缘起

从学术脉络来看，主流媒体网站的母职建构属于媒介与女性研究的范畴，而这项研究则需要追溯到西方的女权运动。女权运动在西方迄今为止一共掀起过四次浪潮。在 19 世纪

^① 王思嘉：《媒介话语与女性生育观建构研究(1980-2021)》，辽宁大学硕士论文，2023 年。

中叶至 20 世纪初,随着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的深入,被启蒙运动唤醒的女性开始投入政治运动和社会生产,她们反对公然的性别歧视,争取受教育权、就业权、选举权等政治权利的平等,但是“第一次浪潮”只带来表面的平等,并未实现事实上的平权;二战结束后,原本因为战争期间劳动力短缺而走出家门的女性,被政府号召重回家庭,以便为回归社会的男性“腾出”就业岗位,这触发了女权运动的“第二次浪潮”^①。以波伏娃为代表的女权主义者主张,“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是社会将女性建构为与男性相对的处于劣势地位的“他者”^②,并且赋予其生儿育女的使命和温顺谨慎的枷锁。这一时期的思潮触及了制度背后的社会文化与观念,并且开启了西方性别研究的历史,对性别平等的审视也从公共领域拓展到了私人领域。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政坛的保守主义势力对包括女性主义在内的自由派力量实施打压政策,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在 80 年代末跌入低谷^③。

20 世纪 90 年代,女权运动的“第三次浪潮”逆流而上,它不再强调“消除两性差异”和“女性立场”,而是主张以社会正义为准则,尊重两性之间和女性内部的差异,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流派是后现代女性主义^④。后现代女性主义主张“话语即权力”,关注社会文本对女性的“再现”,这也推动了“媒介与性别”研究的发展。1978 年,盖尔·塔奇曼等人主编的《炉床与家庭:媒介中的女性形象》,标志着“性别与传播”正式成为传播学研究的分支^⑤,此后,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女性传播者、女性形象、女性受众、女性经验等方面。2012 年开始的第四次女权运动,借助社交媒体迅速发展,它反对“性别平等已经实现”的观点,关注性骚扰、性暴力、职场歧视、网络厌女症、媒体中的性别刻板印象等。这一方面重新激起了对“第二次浪潮”中相关议题的讨论,另一方面也使得“媒介与性别”研究在互联网的语境下有了更丰富的意涵。

而在中国,1977 年“性别”被纳入了传播学研究的学术体系^⑥。1995 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举行,受到大会筹备的影响,中国大陆的学者开始关注“媒介与性别”的研究。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和民间组织“妇女传媒监测网络”在国内开创了媒介中两性形象研究的先例^⑦。此后,女性主义媒介研究主要关注“女性在传媒中的形象与地位”以及“媒介与女性经验和女性话语的关系”^⑧,兼顾了“不平等”与“抗争”两个方面。前者认为媒体是男性实施霸权的工具,进而关注“失语”的女性如何被言说、消费和歧视;后者则将大众传媒视为性别斗争的场所,关注女性能动的抗争以及她们的叙述、展示等如何被资本收编。在这个过程中,刻板印象、身体政治、消费主义、形象建构、可见性等成为核心议题。而近年

① 周绍雪:《女性主义运动:历史与理论的演进逻辑》,《湖南社会科学》,2009 年第 6 期,第 191-196 页。

②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著:《第二性(合卷本)》,郑克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年版,第 359 页。

③ 王恩铭:《美国历史上的三次女权主义浪潮》,《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 年 3 月 11 日第 712 期。

④ 赵赞:《西方女性主义的诞生背景与三次浪潮》,《哈尔滨学院学报》,2023 年第 3 期,第 35-39 页。

⑤ 陈阳:《性别与传播》,《国际新闻界》,2001 年第 1 期,第 59-64 页。

⑥ 张敬婕:《性别与传播研究 30 年发展轨迹》,《妇女研究论丛》,2009 年第 6 期,第 81-86 页。

⑦ 卜卫:《中国大陆媒介与性别/妇女研究回顾与分析(1995-2005)》,《新闻与传播研究》,2006 年第 4 期,第 78-89+96 页。

⑧ 李敏:《女性主义视域中的媒介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 年第 2 期,第 56-63+96 页。

来,技术的演进又拓展了媒介与性别研究的视野,比如算法审美对“白瘦幼”的推崇、互联网仇恨氛围下的性别对立等。

就研究方法而言,探究媒介中的性别呈现,不仅需要分析语言要素(能指)、诠释符号意义(所指),还要揭示支配与反支配的权力关系^①。媒介与性别研究早期主要使用量化研究方法,比如调查问卷、内容分析,但这些都只能说明现象,未能触及内核。符号学分析、民族志等质化研究方法的引入,对于揭示性别不平等有更宏观的洞察和更敏锐的剖析^②。因而后者渐成趋势,备受推崇。

二、女性主义母职理论

(一) 英文文献研究综述

母职研究起源于第二波女性主义的浪潮,是女性研究的经典议题。这一时期的女性主义者提出“个人的即政治的”(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她们关注生育、母亲职责、家庭劳动、性骚扰等私人情境中蕴含的性别不平等^③。而所谓母职,就是母亲的身份、职责,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观念。

艾德丽安·里奇在《女人所生:作为体验与成规的母性》一书中,对母职的两种含义进行了区分,就像这本书的标题所揭示的那样,母职的第一重含义指向女性的生育能力以及与孩子潜在关系,这是基于女性的生理构造和个人体验而存在的;而第二层含义则是由社会习俗赋予的,是一整套关于母亲身份、职责的信念、标准和价值观念,它以父权制的意识形态为基础,目的在于巩固既有的社会形态和政治制度^④。换言之,母职除了与人的自然属性密切相关,还是父权制下的一种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而里奇的论述也成为了女性主义母职理论的核心^⑤。此后,大量研究开始关注家庭内养育责任的性别分工与社会规范之间的关系。

德国学者 Pfau-Effinger 提出“性别文化模式”的概念来解释不同国家的性别分工,她认为,女性承担的家庭责任很大程度上受到关于两性“正确”劳动分工的主导规范和价值观念的影响^⑥。Duncan 和 Edwards 也认为,集体道德、社会习俗是高度性别化的,他们将社会观念以及对“母亲身份”和“有酬工作”的看法称为“性别化的道德观念”,并且指出,这是解释

① 倪炎元:《再现的政治:解读媒介对他者负面建构的策略》,《新闻学研究》,1999年第58期,第85-111页。

② 曹晋:《批判的视野: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Media and Gender Studies)评述》,《新闻大学》,2005年第4期,第3-12页。

③ 都岚岚:《后回潮时代的美国女性主义第三次浪潮》,清华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

④ [美]艾德丽安·里奇著:《女人所生:作为体验与成规的母性》,毛路、毛喻原译,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

⑤ 吴小英:《母职的悖论:从女性主义批判到中国式母职策略》,《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21年第2期,第30-40页。

⑥ Pfau - Effinger, Birgit. "Gender cultures and the gender arrangement—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cross - national gender research." *Innovation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11.2 (1998): 147-166.

单身母亲是否参加有酬工作的主要因素^①。换言之，社会文化会发展出一整套与其自身相符的道德观念，进而规制母亲的育儿行为。

具体而言，生育并不完全是基于个人意愿的选择，那些不愿意生育的女性通常被认为是自私的，与此同时，媒体通过宣传科学话语，为女性怀孕创造了一个正确的时间，选择“错误时间”怀孕的母亲则需要对潜在的健康后果负责^②。而社会对于适当养育条件的认知，比如家庭的经济水平，以及对何为“好”母亲的定义，也会影响女性的生育决策，那些认为自己无法达标的女性会推迟生育决定^③。在养育过程中，对“好”母亲的各项要求可以被概述为“密集母职”，这种理念认为，母亲是儿童的首要照护者，她应当放弃对于职业和个人发展的追求，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资源和爱来确保儿童的健康成长^④，如果母亲的工作妨碍了母职的践行，那么她们就会受到批评。

不难发现，女性主义的权利话语和传统的母职定位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冲突。在母亲独自照料孩子的情况下，女性必然会被迫走向自我牺牲而非性别平等。而对母职的一味神化则会维持不平等的性别权力关系，对母亲的自我实现和幸福感造成负面影响，这在职业发展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学术研究中，女性在职场因为生育和母亲身份而遭受的不公正对待被称为“母职惩罚”（motherhood penalty）^⑤，“母职惩罚”贯穿成年女性不同的生命阶段，具体表现为收入降低、晋升受限、遭受歧视等不同的形式。既有研究发现，大众对于年轻女性“潜在母亲身份”的偏见，会影响女性的职业选择和未来愿景，而在她们成为母亲后，这种不利的境况会继续恶化^⑥。由于当代的社会生活是基于“母亲是儿童的照料者”这一假设而组织的，因此当孩子需要“更称职的父母”时，母亲的就业机会就会受到限制^⑦。

除了照料职责对于工作时间、精力的实际影响，“母亲”作为一种显著的身份特征，也会导致对女性能力和可靠程度的低价值判断以及更为严苛的审查，从而影响其雇佣、晋升机会和起薪，换言之，社会文化对于“母亲职责”和“理想工人”的预设存在冲突，即前者必然会将重心放在家庭，而后者则需要全身心投入工作^⑧。因此，母亲或作为“潜在母亲”的女性，

① Duncan, Simon, and Rosalind Edwards. "Lone mothers and paid work-Rational economic man or gendered moral rationalities?" *Feminist economics* 3.2 (1997): 29-61.

② Budds, Kirsty, Abigail Locke, and Vivien Burr. "'Risky business' constructing the 'choice' to 'delay' motherhood in the British press." *Feminist Media Studies* 13.1 (2013): 132-147.

③ Budds, Kirsty, Abigail Locke, and Vivien Burr. "'For some people it isn't a choice, it's just how it happens': Accounts of 'delayed' motherhood among middle-class women in the UK." *Feminism & Psychology* 26.2 (2016): 170-187.

④ Hays, Sharon,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Motherhood*,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97.

⑤ Correll, Shelley J., Stephen Benard, and In Paik. "Getting a job: Is there a motherhood penal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2.5 (2007): 1297-1338.

⑥ Thébaud, Sarah, and Catherine J. Taylor. "The specter of motherhood: Culture and the production of gendered career aspirations i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Gender & Society* 35.3 (2021): 395-421.

⑦ David, Miriam E. "Motherhood and social policy-a matter of education?" *Critical Social Policy* 4.12 (1984): 28-43.

⑧ Correll, Shelley J., Stephen Benard, and In Paik. "Getting a job: Is there a motherhood penal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2.5 (2007): 1297-1338.

被认为是“劣质”的市场劳动力。但是，成为父亲通常不会面临类似的“惩罚”，与孩子、妻子的良性互动甚至会带来“父亲溢价”^①，这同样是因为社会文化预设女性会承担更多的家庭职责。

相较于拥有相同人力资本的已婚男性，已婚女性在单位时间内的收入更低^②。即使男性和女性在职业生涯之初的收入水平相当，孩子的到来也会扩大二者的收入差距^③。实验研究还表明，当成为母亲的女性在事业上取得成功或者表现得很自信时，参与者会认为她们在人际关系上存在缺陷，不如其他方面表现相同的父亲性情温暖^④。另有研究发现，当单身父亲成为儿童的主要照顾者时，他们也会承受类似于“母职惩罚”的“父职惩罚”^⑤。这从侧面佐证了，职场对女性的歧视与她们的照护职责紧密相关。

不可忽视的是，作为母亲的体验真实地给一部分女性带来了快乐、创造性、慰藉等积极的心理感受，因而母职也被视为个人的主动选择。一项针对澳大利亚女性的调查认为，虽然年轻母亲会部分地内化社会话语，但是她们也具备反抗文化建构、摆脱身份定义的自主权^⑥。而对多米尼加共和国年轻女性的研究指出，母亲的身份给这些贫困女性带来了无条件的爱、未来的目标感、经济保障的希望，并且帮助她们完成了向成年的过渡^⑦。

但是，正视和尊重女性的内在体验和主动选择，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社会结构中隐含的压迫。反思母职话语和实践中蕴含的性别不平等，也不意味着否定母亲身份的积极面向，更不是鼓励女性抵制生育。研究发现，对于拥有母亲身份的女性而言，重视工作和重视母性呈正相关；而对于那些尚未成为母亲的女性而言，做母亲的想法并非与工作相竞争，而是与闲暇时间相竞争^⑧。这表明，“母亲”和“工人”身份的对立是错误的文化假设，通过减轻沉重的母职负担，在释放生育意愿和促进职场性别平等之间，完全有达成一致的可能。

（二）中文文献研究综述

梳理中文文献可以发现，原始社会末期，家庭的产生使得母职和妻职成为女性的专门职责，“贤妻”“良母”的行为规范随之形成、延续；自维新运动以来，资产阶级赋予了贤、良

① Killewald, Alexandra.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fatherhood premium: Marriage, coresidence, biology, and fathers' wag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8.1 (2013): 96-116.

② Becker, Gary S. "Human capital, effort, and the sexual division of labor."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3.1, Part 2 (1985): S33-S58.

③ Juhn, Chinhui, and Kristin McCue. "Specialization then and now: Marriage, children, and the gender earnings gap across cohort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31.1 (2017): 183-204.

④ Benard, Stephen, and Shelley J. Correll. "Normative discrimination and the motherhood penalty." *Gender & Society* 24.5 (2010): 616-646.

⑤ Steffens, Melanie C., Sabine Preuß, and Carolin Scheifele. "Work-related impression formation: Reviewing parenthood penalties and investigating a "fatherhood penalty" for single fathers." *Basic and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41.5 (2019): 287-304.

⑥ Shea, Rebecca, Lia Bryant, and Sarah Wendt. "'Nappy bags instead of handbags': Young motherhood and self-identity." *Journal of Sociology* 52.4 (2016): 840-855.

⑦ Salusky, Ida. "The meaning of motherhood: Adolescent childbearing and its significance for poor Dominican females of Haitian descent." *Journal of Adolescent Research* 28.5 (2013): 591-614.

⑧ McQuillan, Julia, et al. "The importance of motherhood among women in the contemporary United States." *Gender & Society* 22.4 (2008): 477-496.

以新的内涵,倡导女性通过相夫教子实现“强国善种”的目的,这种重新界定虽然突破了“三从四德”的封建枷锁,却仍然是男尊女卑的产物^①。其后的新文化运动对于“贤妻良母”有了更深入的思考,新型知识分子试图以两性为主轴的性别秩序,替代以父子为主轴的父权秩序,但是这个新秩序仍然是高度性别化的,它遵循以男性为中心的科学话语和认识论,其中的进化论者从社会秩序、人类进化的角度要求女性承担母职,反对女子独身^②。王向贤通过回溯 1929-1933 年间国共两党的劳动法条文指出,通过生育保障和禁忌劳动,比如只为女性提供带薪生育假、托幼服务,默认男强女弱等,国共两党的劳动法协同建构了父职和母职的基本模式:母亲以家庭中的无酬照顾为主、以经济收入为辅;父亲则承担主要的经济抚育责任,照料子女的时间和意识不足^③。

上个世纪 50 年代起,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大背景下,国家建立起公共托幼系统,塑造了一批“重工作,轻抚育”的“工作母亲”^④。但是,包括育儿在内的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并不充分,且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在面对革命工作和再生产职责的矛盾时,妇女被要求发挥革命意志来克服这些困难^⑤。20 世纪 70 年代,托幼事业得以恢复发展^⑥,但是在 90 年代经济体制改革之后,随着企事业单位社会职能的剥离,育儿重新变成了私人领域的事情,社会文化转向了对母职的强化,并且强调“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⑦。而在当下,母职建构则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科学母职、消费母职、教育母职、经济与抚育的双重职责等层层加码,挤压了女性的主体意识,并且将母亲们面临的集体困境转化为私人领域的问题^⑧。

对于当代女性而言,在生理层面,孕期的女性容易因为担心胎儿健康,从而对进食、体重控制和产检结果产生焦虑情绪^⑨;“母乳最优”的科学话语和“神圣母职”的牺牲情结,也使得母亲的饮食、睡眠、着装等都为婴儿的需求服务^⑩。而在职业层面,改革开放以来,女性因家庭和生育而受到的母职惩罚不断加剧,子女数量与女性工资呈负相关^⑪。在经济增速放缓的当下,传统观念的回归和生育政策的放开,使得女性面临更大的职场危机,女性的就业机会更少、薪酬更低、职业生涯中断的概率更高,多孩母亲的弱势地位更为明显^⑫。在

① 吕美颐:《评中国近代关于贤妻良母主义的论争》,《天津社会科学》,1995 年第 5 期,第 73-79 页。

② 宋少鹏:《清末民初“女性”观念的建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 年第 5 期,第 102-116 页。

③ 王向贤:《承前启后:1929-1933 年间劳动法对现代母职和父职的建构》,《社会学研究》,2017 年第 6 期,第 165-188+245 页。

④⑦ 金一虹:《社会转型中的中国工作母亲》,《学海》,2013 年第 2 期,第 56-63 页。

⑤ 宋少鹏:《从彰显到消失:集体主义时期的家庭劳动(1949-1966)》,《江苏社会科学》,2012 年第 1 期,第 116-125 页。

⑥ 刘中一:《新中国 70 年 | 我国托育发展的七十年》,https://www.cpdrc.org.cn/ztlj/70/201910/t20191009_2924.html,2019 年 10 月 9 日。

⑧ 施芸卿:《当妈为何越来越难——社会变迁视角下的“母亲”》,《文化纵横》,2018 年第 5 期,第 102-109 页。

⑨ 高碧叶:《中国女性孕育过程中的母职与母性赋权实践》,《广东社会科学》,2021 年第 3 期,第 198-209 页。

⑩ 许怡,刘亚:《母职初体验:基于自我民族志与网络民族志的城市女性哺乳实践研究》,《山东社会科学》,2017 年第 8 期,第 95-106 页。

⑪ 申超:《扩大的不平等:母职惩罚的演变(1989-2015)》,《社会》,2020 年第 6 期,第 186-218 页。

⑫ 杨菊华:《“性别—母职双重赋税”与劳动力市场参与的性别差异》,《人口研究》,2019 年第 1 期,第 36-51 页。

性别分工方面,由于女性在职场中处于劣势地位,且家务劳动无法换算成薪资,因此,男性的经济收入和家庭地位普遍高于女性,这固化了家庭内部乃至整个社会的性别分工,也促成了性别意识的代际延续^①。即使是面对留守儿童,在外务工的父母的亲职实践也仍然受限于不对等的性别脚本,母亲更多地为孩子提供情感慰藉和生活照护^②。此外,年轻母亲的务工常常伴随着中老年母亲的隔代抚育^③,虽然“婆代母职”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母职困境,但是抚育的女性偏向仍未改变。而在中国公共教育转型的大背景下,教育的公益性弱化、私益性显著^④，“教育拼妈”的现象使得母亲的职责从孕育、哺乳、生活照料扩展到了课业管理、教育介入等方面^⑤。父亲参与育儿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选拔、教育和分层方面的母职焦虑，但是在当下，父亲深度参与育儿尚未成为常态。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女性性别观念的觉醒和经济地位的提升,综合运用各种策略“再造母职”成为了一种新的趋势。中产阶层的女性充分调动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源,在分娩阶段,注重自身的身体经验和心理感受;在抚育方面,协助丈夫做好父职的准备,开启了新的家庭分工^⑥。粤港澳大湾区创业妈妈则为母职注入了自我实现、精神引领的新内涵,她们通过调整时间表、空间安排和团队调度等方式,追求事业、家庭与自我发展的平衡^⑦。而在乡村,由于丈夫收入的不稳定和生活、教育成本的增加,乡村女性的经济供养职责日益受到重视,挑战了抚育为先的传统母职^⑧。但是,总体而言,照料责任的性别分工和公共服务的缺位仍然使得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承担着“性别-母职的双重税赋”^⑨。

三、媒介的母职建构

(一) 英文文献研究综述

从英文文献多面向的研究中,可以发现,在任何文化中,母职的建构都伴随着一整套限制女性欲望和需求的意识形态^⑩。与此同时,母亲的形象和职责又被媒体塑造,用于服务既有的社会制度、政府决策和文化秩序。在具体的操作中,媒体通过对女性适当行为的描述和意象的累积,鼓励“密集母职”,并通过对“破碎女性”的叙述创造了坏母亲的形象^⑪,潜

① 王珀:《性别平等与母职惩罚》,《生命哲学研究》,2022年第1期,第149-159页。

② 吕山,李熠,林颖:《远距离“做家庭”:留守儿童家庭的媒介驯化与亲职实践》,《新闻与写作》,2022年第11期,第92-106页。

③ 陈莹骄:《婆代母职:女性农民工的抚育职责及生命历程重置》,《求索》,2023年第3期,第179-187页。

④ 姚岩:《学龄儿童母职角色再制的社会学思考》,《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8年第2期,第37-42页。

⑤ 金一虹,杨笛:《教育“拼妈”:“家长主义”的盛行与母职再造》,《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第61-67页。

⑥ 王蕾:《母职策略:城市中产女性孕产期的母职实践》,《社会建设》,2022年第3期,第64-78页。

⑦ 裴谕新,龚泽玉:《“鸡娃不如鸡自己”:粤港澳大湾区创业女性的母职再造》,《妇女研究论丛》,2022年第05期,第70-82页。

⑧ 肖索未,汤超萍:《流动的母职:乡城迁移中的母职协商》,《妇女研究论丛》,1981年第2期,第66-83页。

⑨ 杨菊华,孙超:《论劳动力市场的“性别-母职双重税赋”》,《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第93-103页。

⑩ Otomo, Rio. "Redrawing a map of motherhood." *Japan Forum* 29.2 (2017): 180-195.

⑪ Simon, Jenni M. "Disciplining drunken mothers: media representations of women's use of alcohol." *The*

移默化地发挥着社会化的功能。

在 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初的英国, 为了适应工业资本主义公私领域的劳动分工, 杂志《The Lady's Magazine》的关注焦点从时尚风格转向了中产阶级的家庭生活, 它将“温柔母亲”的概念合法化、永久化、神圣化, 为女性在家庭内外的角色期望提供了文化支持^①。一战期间, 美国媒体淡化母亲对孩子的保护行为, 协助威尔逊政府塑造并鼓励了不惜牺牲孩子的、伟大的爱国之母的理想形象^②。20 世纪前后, 受到科学意识形态的影响, 育儿手册、文化论坛、女性杂志、商品广告都要求女性听从专家和医生的建议, 那些遵从育儿本能的母亲被认为是失败的^③。而在 20 世纪中后期, 杂志广告中的母职建构从“以家庭为中心”转向了“以儿童为中心”, 并且延续了对专业知识的推崇, 而科学对母亲权威的剥夺, 最终使得消费文化大行其道^④。

在就业方面, 对于《纽约时报》的研究指出, 苦恼的职业女性的主题在报道中频繁出现, 而代表职业母亲立场的女权主义的论点却在逐步减少, 这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性别革命的停滞不谋而合^⑤。印刷媒介强调那些受过高等教育却最终退出职场的女性是自主选择的, 认为她们重视家庭和母性, 并且盛赞这是女权主义的胜利, 这样的描述显然掩盖了女性在家庭和事业中面临的两难选择和结构性困境^⑥。而这一时期的电视媒介也用模棱两可的形象削弱了自由主义女权的影响, 它所塑造的职场女性对爱情和家庭生活抱有一种怀旧的渴望^⑦。这些媒介建构的切片都反映出, 随着第三次女权运动的退潮, 鼓励女性回家、推崇传统母职的思潮卷土重来, 媒体将女性的集体困境转译为个人选择, 忽略了深层次的社会和制度性因素, 从而简化了性别平等和女性权益的复杂性。

时至今日, 那些拒绝接受养育指示的母亲仍然会受到批评, 虽然社交媒体成为了母亲宣泄负面情绪的渠道, 但是通过在线交流获取的情感支持是短暂的, 并没有能够打破“好妈妈”的文化框架^⑧。即使是已经移民的母亲, 在使用移动媒体时, 仍然会试图扮演母国文化所定义的“好母亲”的传统角色^⑨。此外, 大量的网络信息, 尤其是名人母亲的话语, 也形成

communication review 17.1 (2014): 45-64.

① Tobin, Beth Fowkes. "The tender mother: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motherhood and the lady's magazine." *Women's Studies: 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18.2-3 (1990): 205-221.

② Garner, Ana C., and Karen Slattery. "Mobilizing mother: from good mother to patriotic mother in World War I."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14.1 (2012): 5-77.

③ Apple, Rima D. "Constructing mothers: Scientific motherhood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8.2 (1995): 161-178.

④ Lynch, Karen Danna. "Advertising motherhood: Image, ideology, and consumption." *Berkeley journal of sociology* 49 (2005): 32-57.

⑤ Motro, Joanna, and Reeve Vanneman. "The 1990s shift in the media portrayal of working mothers." *Sociological Forum* 30. 4(2015):1017-1037.

⑥ Kuperberg, Arielle, and Pamela Stone. "The media depiction of women who opt out." *Gender & society* 22.4 (2008): 497-517.

⑦ Press, Andrea. "Gender and family in television's Golden Age and beyond."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625.1 (2009): 139-150.

⑧ Lehto, Mari. "Bad is the new good: Negotiating bad motherhood in Finnish mommy blogs." *Feminist Media Studies* 20.5 (2020): 657-671.

⑨ Lee, Yoon-Joo, and Huan Chen. "Empowerment or alienation: Chinese and Korean immigrant mothers' perception of mobile media in constructing their social role and facilitating parenting practices in the

了对女性的另一种压制,因为它强化了妈妈们的社会比较倾向并且鼓励竞争,游刃有余的名人妈妈俨然成为职场女性的榜样,也因此成为了推行密集母职的工具^①。值得注意的是,母职的盛行与父职的隐身在媒体中并存。在虐待儿童的相关报道中,父亲基本都处于边缘或缺席位置,母亲则被描述为对照顾孩子负有全部责任,“无法保护孩子的坏母亲”的形象反复出现,而通过对母亲的妖魔化,媒体转移了文化、政治和道德体系在儿童问题上的责任^②。由此可见,即使是在性别意识相对领先的西方,抚育儿童的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也往往被媒体简化为母亲的责任。

(二) 中文文献研究综述

“母职研究”近年来已然成为中国性别研究的热点话题,媒介在建构母职规范中的作用也得到了关注。抗日战争时期,《新华日报》试图剔除贤妻良母的传统模式,塑造“独立女性”的新形象^③。周恩来也在1942年的《妇女之路》上撰文指出:以“尊重和提倡母职”代替“贤妻良母”的旧观念^④。20世纪80年代初,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背景下,育儿杂志呈现的是兼顾工作与家庭的双职工父母形象,倡导“为国教子”;90年代以来,随着公共托幼体系的瓦解,社会的性别分工观念越来越明显,育儿杂志倡导母亲提高自身素质,践行培养国家接班人的重任;而21世纪以来,与中产阶级的消费文化勾连的“独立自主”的母亲形象受到大众媒体的推崇^⑤,消费类话语成为了孕育类App的主导话语^⑥。

基于对2000-2018年间的育儿杂志的文本挖掘,有研究提出,育儿杂志强化了传统的性别分工,将母亲塑造为科学育儿的首要责任主体,并强化了“密集母职”的理念^⑦。而对《爸爸去哪儿》的个案研究则指出,该节目仍然将父亲定位为辅助者、经济提供者和支持者,并且延续了男性主导户外这一“公领域”,女性在“私领域”料理家务的传统空间结构^⑧。此外,“辣妈”为自己而活等流行话语所反映的母亲形象的改变,并不是女性自主意识发展的结果,而是男权文化和消费文化对女性提出的更高要求,在缺乏制度保障的前提下,“全能辣妈”的话语只会使女性承担更多的责任和风险^⑨。

虽然弥漫于网络的消费主义话语为母亲套上了新的枷锁,但是,社交媒体也为反抗传

US," *Mobile Media & Communication* 6.3 (2018): 390-406.

① Chae, Jiyoung. "'Am I a better mother than you?'" Media and 21st-century motherhood in the context of the social comparison theory." *Communication Research* 42.4 (2015): 503-525.

② Niner, Sara, Denise Cuthbert, and Yarina Ahmad. "Good mothers, bad mothers: motherhood, modernity and politics in representations of child abuse in Malaysia's English-language newspapers." *Feminist Media Studies* 14.6 (2014): 993-1011.

③ 田竞开:《抗战时期〈新华日报〉的妇女报道分析》,《青年记者》,2018年第27期,第101-102页。

④ 吕美颐:《评中国近代关于贤妻良母主义的论争》,《天津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第73-79页。

⑤ 陶艳兰:《塑造理想母亲:变迁社会中育儿知识的建构》,《妇女研究论丛》,2016年第5期,第25-37页。

⑥ 张竞丹:《孕育类App中的母职再现》,《新媒体研究》,2021年第24期,第22-24+30页。

⑦ 陈蒙、陈倩:《大众媒介中的科学育儿话语和母亲角色再现——基于〈为了孩子〉杂志(2000-2018年)的文本挖掘》,《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第61-70页。

⑧ 郑春风、郑生竹:《父职的媒介再现、社会再生产与现代中国家庭的结构转型——以〈爸爸去哪儿〉为例》,《新闻界》,2019年第9期,第70-81页。

⑨ 沈奕斐:《辣妈:个体化进程中母职与女权》,《南京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第69-77页。

统母职提供了一定的空间。由孕产妇组成的网络微信群，为妈妈们提供了工具性支持和情感慰藉^①；母婴短视频拓宽了育儿女性进行多元自我呈现的空间^②，而“爸爸博主”的出现也有助于打破性别分工的迷思和性别气质的刻板印象^③。

（三）中英文文献总结

综上所述，在媒介与母职建构方面，国外学者聚焦于女性杂志、育儿杂志、商业广告、严肃报刊、电视媒介、社交媒体等对于“母职”的建构，分析背后蕴含的科学主义、消费主义、政治倾向等意识形态，批判色彩鲜明。而国内的研究主要关注综艺节目、育儿杂志和社交媒体中的母职建构，其结论多聚焦于对消费文化的批判以及对社交媒体赋权的肯定。总体来看，主流媒体矩阵（包括报刊、官方网站及其社交账号等）作为意识形态的载体，并没有被研究者纳入母职研究的中心视域。

总体来看，中英文文献所描绘的媒介对于母职的建构，可以被概括为神圣母职、密集母职、科学母职、消费母职和教育母职五个面向。它们各自产生于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却并存于当代的媒介生态中，共同塑造着大众对于“母亲”角色的期待，并且伴随着女性主义思潮的受阻和对女性回归家庭的重申。而其中又隐含了四重矛盾，即：母亲是自私还是无私的，母亲应当促进儿童的独立还是依赖，母亲在家庭领域和公共领域的身份是否冲突，母亲是本能的还是需要专家帮助^④。

四、主流媒体矩阵的母职议题

（一）研究现状

如前文所述，关于主流媒体母职建构的研究尚存空白。目前虽然有一些关于母亲形象的大众传媒研究，但止于强调其多元化、污名化、脱离现实等，缺乏基于性别视角的理论纵深，也没有正面触及母职概念及相关理论。另有文章在分析“携程亲子园虐童事件”相关报道中的女性形象时，提及了报道对“母职”刻板印象的强化^⑤，但是文章聚焦的仍然是公共事件而非家庭领域，且对“母职建构”的论述只占据较小的篇幅。

如果将关注的面向从“母职”转向“生育”，则会有更多的发现。针对主流媒体“三孩”议题报道的分析指出，相关报道以政策及其配套措施解读为主，存在立场失衡、群众话语权不

① 李梦竹：《社交媒体赋权：微信育儿群对母职自主性的建构》，《当代青年研究》，2022年第3期，第68-74页。

② 王欢：《仪式视角下母婴短视频的主体呈现、观看逻辑和生育文化困境》，《东南传播》，2023年第1期，第1-5页。

③ 吴璟薇、张雅迪：《数字实践中的“混合父职”建构：爸爸博主的在线自我呈现》，《妇女研究论丛》，2022年第2期，第70-84页。

④ Johnston, Deirdre D., and Debra H. Swanson. "Undermining mothers: A content analysis of the representation of mothers in magazines."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6.3 (2003): 243-265.

⑤ 罗汉、邹月华：《媒介、话语与性别：虐童报道中女性形象研究——以“携程亲子园虐童事件”为例》，《新闻爱好者》，2020年第10期，第89-91页。

足等问题^①。基于微博的“三孩政策”研究表明，主流媒体的议程与公众议程存在显著相关性，但是在议程的指向上存在冲突^②，并且会因为性别对立、生育压力、女性权益等衍生议题产生舆论失焦^③。对《中国妇女报》的研究显示，近年来，生育相关报道缺乏新闻深度、负面报道减少、对普通受众的关注度降低^④。遗憾的是，这些研究虽然关注生育议题，但是缺乏性别视角，结论大多停留在反思媒体报道方式的不足，缺乏对其性别观念的审视。

（二）原因分析与反思

主流媒体的母职建构之所以没有引起重视，大抵有两层因素。一方面，我国大众媒介研究的性别意识仍然不足，聚焦的仍是男性中心视角下的重要活动，报纸中的母职和育儿是大众习以为常的“不重要”的存在。另一方面，在性别领域，国内的媒介与女性研究大多从社会性别理论切入，关注作为整体的女性的媒介形象、社会参与和公共领域的权力。妇女所属的阶级、代际、地区等议题往往被忽视^⑤，对妇女解放程度的衡量也极少关注家庭生活场所^⑥。然而，考虑到与母职建构相关的意识形态批判、性别分工、妇女权益保护等问题和当前女性面临的母职困局，本文认为，补充这一空白有充分的必要性。

从个体角度而言，虽然现代女性有婚育之外的人生选择，但是家庭仍然是很多女性绕不开的生命体验。从国家层面出发，随着现代女性性别意识的觉醒，只有在以性别平等为基础的社会和家庭环境中，政府推行的生育政策才有可能落地。因而，大众和媒体的性别意识不能仅仅停留在让女性拥有平等参与工作的机会，也应该延伸到对家庭和社会角色的深刻理解和重新构建，并且在教育、法律、价值观念和社会政策等多个层面推进性别平等和包容。正如 Dillaway 和 Pare 所言，如果将育儿仅仅视为母亲的家庭活动，并将育儿问题私人化，那么女性就无法获得来自丈夫和社会的支持；如果忽视育儿与职场之间的斗争与关联，那么不平等的制度也不会受到挑战^⑦。育儿、家务劳动，以及与此相关的经济社会变革、性别意识形态，都应当被视为严肃的公共问题。

第三节 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① 胡颖蕾、刘英杰：《框架理论视角下主流媒体的三孩议题报道分析——以人民网、新华网为例》，《科技传播》，2023年第8期，第63-65页。

② 张雪：《基于微博的三孩生育政策网络议程设置研究》，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23年。

③ 李奕纯、刘英杰：《保护动机理论视角下生育政策议题的舆论失焦与矫正》，《新媒体研究》，2022年第15期，第11-14+20页。

④ 王之尧：《〈中国妇女报〉计划生育报道的话语变迁研究(1984-2021)》，河北大学硕士论文，2023年。

⑤ 卜卫：《女性主义媒介研究：“理论旅行”与地方知识生产》，《新闻与传播研究》，2021年第9期，第55-74+127页。

⑥ 王开敏：《对现代传媒表现中母亲形象的思考》，《电视时代》，2010年第21期，第16-17页。

⑦ Dillaway, Heather, and Elizabeth Paré. "Locating mothers: How cultural debates about stay-at-home versus working mothers define women and home."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29.4 (2008): 437-464.

本文选定的研究对象是以人民网为代表的主流媒体网站。人民网具有新闻聚合的功能，它汇集了人民网的主站新闻（其中包括人民网各省频道）、光明日报、南方日报、央视网、新华网等权威媒体的新闻报道。综合来看，它能够比较完整地呈现主流媒体网站的报道样态。此外，相较于《人民日报》的官方微博，新闻网站受公众议程的影响较小，在文字内容方面也更加具体、详实，原创程度更高。因而，这也可以更鲜明地体现媒体议程和新闻框架。

在人民网的搜索结果中，有一部分明确提示：此文属于商业信息，不代表本网观点。相关内容多为带有医学科普性质的文章，且文末会备注供稿来源。考虑到网站在内容的选稿、编辑和发布中扮演着把关者的角色，且为该内容提供了传播渠道和品牌背书，因此，本研究将这一部分内容仍旧囊括在内。

通过对比性质相同的“人民网”和“新华网”的数据库容量，可以发现，就“母亲”“生育”相关的话题而言，前者的样本数量更大。因此，本文的研究对象最终确定为经由人民网搜索栏 (<http://search.people.cn>) 获取的、来源于各大主流媒体网站的聚合新闻（下文简称“人民网”）。受限于“人民网”的检索系统，本研究未能获取 2019 年及以前的材料，聚焦的是近四年（2020-2023）的新闻文本。

二、研究问题

本文试图探究主流媒体网站运用了何种话语策略建构母职，又建构了怎样的母职？其中是否存在性别歧视、刻板印象，是否复刻了不合理的性别分工？这背后的影响因素又有哪些？

考虑到本文是一项基于新闻文本对母职建构进行反思的研究，这里需要对“新闻文本”和“母职建构”的含义做进一步的界定。首先，媒介批评是对于新闻作品、媒介行为、媒介现象、媒介性质及作用的批评^①，而不是对于特定媒体编辑部的批评。鉴于以“人民网”为代表的主流媒体网站有明确的宣传定位，其报道中涉及大量来自地方政府或官方组织的稿件，也包含对于主题活动、政策文件、观念导向的频繁“复述”，因而本研究无意于、也无法明确区分媒体话语、政策话语、组织话语的界限，而是综合分析这些以新闻形式出现的文本，如何借由“人民网”这一渠道呈现，并协同建构了公众对于母职的认知。事实上，正是这些官方话语而非编辑部的主观意志，塑造了“人民网”的权威性，也再造了新闻生产可以使用的话语资源。

其次，考虑到汉语中常常出现与“母亲”相关的隐喻或固定搭配，因而本文所讨论的“母职”概念并不局限于母亲对孩子的实际职责，而是试图探究与“母亲”身份相关的文化意涵与社会期待，这些文化期待会间接作用于母亲与孩子的互动以及性别分工。因而，本文在主

^① 谭舒、董天策：《媒介批评：疑问与思考》，《新闻记者》，2002 年第 2 期，第 24-26 页。

体框架中区分了作为“文化意象”和作为“生育主体”的母亲。

三、研究方法

为了探究大样本量新闻文本的分布规律及其深层含义，本文拟使用文本挖掘和批判性话语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为了将两种研究方法更好地融合，同时突出“母职建构”这一核心脉络，本文在主体的行文结构上，从母职的不同侧面展开；而在具体的小标题下，则使用批判性话语分析的研究方法，考察新闻文本使用了哪些生产策略、构建了何种母职，其社会背景和影响又是什么。

（一）数据收集

本文采用文本挖掘的方法进行数据收集。文本挖掘作为机器学习在文本分析中的应用，区别于传统的内容分析法，它以词句为分析单位，能够快速处理大样本数据。在研究过程中，可执行的操作步骤通常包括：确定研究对象，选择文本数据并进行预处理；根据词频和 TF-IDF 值提取特征词，形成词云图；分析特征词之间的关联，生成共词矩阵；基于 LDA 主题模型进行主题分类；进行词语的情感倾向分析等^①，基于研究问题和文本特征的不同，在不同的研究中可以对这些步骤进行拆分重组。本文则侧重于词频分析、共词分析和情感分析。

在确定了以“人民网”为研究对象后，本文使用八爪鱼采集器作为辅助，以“母亲”“妈妈”“妈”“父亲”“爸爸”“爸”“生育”等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抓取相关的新闻标题和摘要，并利用统计分析软件“微词云”（fenci.weiciyun.com）进行词频分析、共词分析和情感分析。考虑到“爹”“娘”是极具地域性特质的方言用词，且出现频率很低，在大样本量的情境下，对于研究结果几无影响，因此未将其纳入检索词中。这里之所以选择新闻标题和摘要，而非全文，主要受限于技术因素。在抓取全文的情况下，一则所得的样本量过大，既有的分析软件无法处理；二则，由于不同网页的页面结构不同，遵循特定规则的采集软件只能抓取部分文章的正文内容，从而造成样本之间完整性的差异。

考虑到标题和摘要是为了吸引读者阅读而编写的，按照新闻生产的规律，它能够体现新闻的关键词与核心内容，因而，本文认为，以标题和摘要的组合作为单条样本，是一种合适的选择。为弥补颗粒度不足的问题，在着手进行文本分析时，也会选择典型文章进行全文精读。而在选择检索词时，之所以将“父亲”等纳入考察，目的在于将父亲形象和父职作为对照组，从而凸显母职建构的特殊之处。

受限于网站的显示机制，在一个关键词下，最多只能抓取 5000 条数据，且年份集中于 2020-2023 年。2023 年 8 月 1 日的采集结果显示，在“母亲”“妈妈”“妈”三个检索词下，去除

^① 张公让、鲍超、王晓玉等：《基于评论数据的文本语义挖掘与情感分析》，《情报科学》，2021 年第 5 期，第 53-61 页。

重复数据后,共获得与母亲相关的文本数据 9515 条。在“父亲”“爸爸”“爸”三个检索词下,去重后共获得与父亲相关的文本数据 6855 条。

分析所得数据可知,数据的发布时间集中在 2020-2023 年,也就是在 2016 年中国实行全面二孩政策以后^①。期间的一个关键性节点是 2021 年 5 月 31 日,此时,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的新政策^②。考虑到“二孩政策”与“三孩政策”具有连续性,目的都在于促进生育,而且“三孩政策”的筹备、推动本身也是一个有机过程,无法从特定的时间节点切割开来。因此,为了在现有条件下获得更丰富的文本量,本文并未剔除 2020 年的数据。基于以上步骤,本文形成了基础语料库,并从词频、主题词、共词等语言特征入手进行话语分析。在分析过程中,本文会根据实际需要、用类似的方法补充其他关键词的检索结果。

在对文本进行预处理的过程中,本文利用内嵌 Jieba 分词包的“微词云”进行中文分词。首先,去除 excel 表格中单个单元格中的换行符,以便将新闻标题及其对应的完整摘要作为一条文本,避免 excel 表格分行导致的语意中断。其次,在使用新词挖掘工具的基础上,设置自定义词典和同义词词典。其中,自定义词典中可以补充出现频率较高、且具有特定意义的连续词组,比如“全职妈妈”“祖国母亲”“爱心妈妈”“母亲河”“职场妈妈”等,以免系统将其切开,使得完整的词语含义无法被有效识别。而在同义词词典中,可以通过设置,使得比如“医保”被识别为“医疗保障”的同义词,这样可以提高词语的凝聚程度。

在分析文本特征时,相较于词频,即词语在文档中出现的频率,TF-IDF (term frequency - inverse document frequency) 值更能反映词语对于文本的重要程度。如果某个词语的 TF-IDF 值越高,那么这个词语在特定文档中的重要程度就越高,就功能而言,使用这个值可以弱化常用词,凸显文本中的关键词。因此,本文选用特定关键词下 TF-IDF 值靠前的数据进行主题分析。

(二) 数据分析

在获取研究数据后,本文采用批判性话语分析进行数据分析。批判性话语分析关注符号与意义之间的互动,试图揭示已然成为惯习的歧视、偏见和背后的社会约束条件与权力关系^③。由于本文试图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切入,分析媒体在母职建构中是否存在性别偏见和刻板印象,因而对文本进行批判性话语分析,是一种必要的研究视角。

综合来看,批判性话语分析的主要理论视角包括诺曼·费尔克拉夫的三维分析框架、梵·迪克的社会认知模式以及鲁斯·沃达克的话语历史方法^④。就其区别而言,费尔克拉夫关

① 新华社:《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 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决定》,https://www.gov.cn/xinwen/2016-01/05/content_5030806.htm,2016 年 1 月 5 日。

② 新华社:《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https://www.gov.cn/zhengce/2021-07/20/content_5626190.htm,2021 年 7 月 20 日。

③ 辛斌、高小丽:《批评话语分析:目标、方法与动态》,《外语与外语教学》,2013 年第 4 期,第 1-5+16 页。

④ 刘峥:《新闻语篇 CDA 研究方法初探——纽约时报拉登之死案例研究》,清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年。

注文本在生产、传播、消费全过程中的社会实践与权力关系，梵·迪克侧重于分析个体如何通过语言结构、修辞、词汇等将社会认知和意识形态融入文本，而沃达克则关注历史语境对于话语的作用^①。考虑到本文聚焦的是近四年（2020-2023）的新闻文本，历史变迁不是主要的考量因素；研究问题关注的是母职建构中是否存在性别偏见，以及这种建构背后的社会因素。因而，相较于梵·迪克，费尔克拉夫的分析框架与本文的研究目标更加匹配，他指出，文本的生产建立在一系列被内化的社会结构基础上^②，因而能够提供一个从微观到宏观的分析视角。

在《话语与社会变迁》一书中，费尔克拉夫总结了包括文本、话语实践以及社会实践在内的三个维度的话语概念^③。首先，在话语分析的视角下，能指和所指的结合伴随着特定的社会动机，为了拆解这些动机，“文本分析”可以从词汇、语法、连贯性、文本结构、互文性、隐喻、言语的力量等方面展开；其次，“话语实践分析”关注文本的生产、分发与消费过程，并认为这些过程受限于传受双方占据的话语资源和当时的社会结构与规范；最后，“社会实践分析”关注话语产生的经济、政治和制度背景，其中又涉及对权力关系、意识形态的分析^④。

基于文本、话语以及社会实践三个面向，本文的研究问题可以进一步细化为：第一，以人民网为代表的主流媒体网站，在与母职相关的报道中，采用了哪些词汇、修辞手法、报道框架，这些报道潜在的文化预设是什么？第二，主流媒体网站如何选择其报道内容和角度，哪些主体参与了话语生产？第三，主流媒体网站塑造的母职形象反映了怎样的性别观念、性别分工和社会结构？

第二章 作为文化意象的母亲

第一节 “自然母亲”的隐喻与天然母职

一、人类中心主义与父权制的同构

在与母亲相关的文本中，TF-IDF 值排名前 13 的词语如图 2-1 所示。可以看到，“长江”“黄河”“母亲河”“生态”“治理”等词语形成了特殊的聚类关系，其中“黄河”“长江”可以被视为“母亲河”的同义词。相关的新闻报道包括“共护母亲河，昆明在行动”“用法治力量守护好母亲河”“保护母亲河，共建生态城”等，主要聚焦于生态环境保护。这些报道虽然没有直接讨论母亲的角色建构，却通过约定俗成的用语，隐喻了母亲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紧密联系。在中国

① 刘峥：《新闻语篇 CDA 研究方法初探——纽约时报拉登之死案例研究》，清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年。

② 胡雯：《费尔克拉夫话语分析观述评》，《牡丹江大学学报》2009 年第 6 期，第 63-65+70 页。

③ [英]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殷晓蓉译，华夏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68 页。

④ [英]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殷晓蓉译，华夏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69-84 页。

的传统文化中，母亲不仅是孩子的养育者，更是生命与自然的象征，和河流一样，她的形象常常被赋予养育、照顾和滋养生命的特质。在“母亲河”的叙事里，折射的是“母亲”作为一个意象的民族底色，类似的表达还有“地球母亲”“祖国母亲”。可以说，自原始的生殖崇拜起，母亲就成为了与国人的心理、命运息息相关的原型^①。

词语	TF-IDF	出现次数
妈妈	0.007270513	13101
母亲	0.006350295	10281
长江	0.006173427	1872
黄河	0.00523442	1634
孩子	0.00521274	4464
保护	0.004177086	1815
工作	0.003799143	2373
生态	0.003742018	1437
活动	0.003703659	2298
开展	0.002976535	1600
母亲河	0.002944323	1222
发展	0.002935634	1341
治理	0.002909333	1024

图 2-1 母亲相关文本中 TF-IDF 值排名前 13 的词语

与“母亲河”共现的高频词包括发展、保护、治理等，这些词语的施动者都是“人类”。但是，正如中国科学院院士丁仲礼指出的那样：“地球并不需要拯救，需要拯救的是人类自己。”同理可得，河流在未受人力干扰的自然状态下，不会遭受严重的污染，也具备自我修复和净化的能力，在多数情况下，河流的保护和治理实际上是人类为了适应自身需求而进行的改造。但是，“母亲河”的叙事，将自然与人类的关系，建构为“母亲”与“孩子”的关系，这就为资源利用和环境改造蒙上了温情的面纱。此外，在“保护”的叙事中，虽然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有所缓和，但是“人类”谋求生存的“利己”行为也被悄然转化为增进生态福祉的“利他”行为。这体现了一种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

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人类中心主义视角之下人与自然的关系，和男权社会中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在结构上是相似的^②。而以“母亲河”为代表的“自然母亲”^③同时内嵌了这两层关系，完成了对“母亲”“河流”等意象的重组和传统规范的内化。具体而言，借由文本的互文

① 李晓宁：《母亲与家园在中国文学中的原型意象》，《漳州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 年第 1 期，第 63-66 页。

② 金莉：《生态女权主义》，《外国文学》，2004 年第 5 期，第 57-64 页。

③ 李家奎、韦清琦：《女性与自然：从本质到建构的共同体》，《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7 年第 3 期，第 38-44 页。

性^①，它将自然为人类提供的栖居之所、生存资源与女性的生育、抚育能力相勾连，这在将“自然女性化”的同时，也在将“女性自然化”^②。其结果是，母亲的形象被构建成生命之源，具有了与大自然相似的特质。由于这类隐喻深深植根于传统文化之中，并且通过一种普遍和根本的途径建构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乃至塑造现实^③，因此，人类对自然的过度开发被合理化，女性也被赋予了育儿的天职与自然特质。

基于此，本文在“自然母亲”一词的基础上提出“自然母职”的概念，用以代指：被赋予大自然特质的母亲所需承担的职责，也就是以一种自然而然且无条件的方式养育后代。这是一种植根于文化和心理层面的隐喻。然而，“自然”有其独立于人类存在的意义，女性也有其母性之外的存在价值，虽然女性在生理结构上具有生育的能力，但是成为母亲终究只是一种选择，如何做母亲更是各有不同，所谓“天性”只是话语和权力建构的产物。

总体而言，“母亲河”的叙事一则体现了先民对于自然和母亲的尊崇，二则反映了文化如何通过象征和隐喻塑造了后人对于女性特质和母亲职责的认知。虽然现代社会和古代社会多有不同，但是由于语言的惯性和文化的韧性，这种表达方式依然通过文学作品和新闻报道，持续地影响着民众的思维结构和价值观念，从而维护既有的社会分工和性别期待。

二、自然母职与文化父职的区隔

虽然本文的研究重点是母职而非父职，但是，只有在对比中，母职的文化特殊性才能够清晰显现。因此，本文对与父亲相关的新闻文本也进行了词频分析。研究发现，在关于父亲的新闻叙事中，体现了一种与母职的自然隐喻相对的文化隐喻。具体而言，在 6855 条数据中，高频关键词是“牺牲”（216 次），“精神”（304 次），“传承”（357 次），“守护”（274 次），“英雄”（225 次）等。相关文本强调讲述父亲的故事、传承父亲的精神，并且与家国情怀、光荣梦想相勾连，比如《无名更是真英雄——我父亲的故事》《女儿继承因公牺牲父亲警号》《儿子高考，交警父亲考场外执勤守护》等。

对其中的高频动词进行共词分析，可以发现，“精神”的邻近词语包括“科学家”“焦裕禄”“延安”“抗美援朝”“八项规定”等，“传承”的邻词包括“技艺”“好家风”“创新”“文化”“红色基因”等，“守护”的邻词则包括“祖国”“孩子”“生命”“团圆”“万家灯火”等。这反映出，在主流媒体网站的叙事中，父亲的形象常常被塑造为具有浓厚民族主义色彩的英雄人物，他们不仅是家庭中的精神引领者和主心骨，还肩负着对国家的忠诚与责任。从框架构建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通过家庭的情感纽带和象征意义来强化国家叙事、塑造集体认同的策略。然而，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来看，这种叙事不仅是对父亲身份的过度理想化和神圣化，还复现了父亲在传统社会结构中的领导者角色。

① [英]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殷晓蓉译，华夏出版社，2003 年版，第 79 页。

② 李家奎、韦清琦：《女性与自然：从本质到建构的共同体》，《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7 年第 3 期，第 38-44 页。

③ [英]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殷晓蓉译，华夏出版社，2003 年版，第 181 页。

为了验证英雄叙事是否在母职建构中有同样的体现,此处以“英雄”一词为例,对父亲和母亲的相关文本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在与父亲相关的6855条文本中,“英雄”共在172条文本中出现了225次,以文本条数为基准进行计算,可得,占比为2.51%;相较之下,在与母亲相关的9515条数据中,“英雄”共在121条文本中出现了177次,占比降为1.27%。

就叙事而言,其中的显著不同在于,父亲通常直接作为建功立业的英雄角色出现,比如《像父亲那样去战斗》《父亲因公殉职 儿子承父遗志考入父亲母校》等。相比之下,除了关于赵一曼的典型宣传,母亲的英雄形象往往通过“英雄儿子的母亲”这一身份才得以呈现,比如《英雄母亲的好儿子》《江苏如东老兵37年信守诺言 为英雄母亲祝寿》等。在《踏寻京郊“红色第一”:英雄母亲邓玉芬》一文中,邓玉芬被视为中华民族英雄母亲的象征,但她的贡献不在于建功立业,而在于“先后把丈夫和5个孩子送上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前线”。全然不同的英雄叙事表明,父亲更多地被视为社会文化中的行动者和领袖,象征着力量、主体性和社会参与;相反,母亲则更多地被视为支持者和抚养者,象征着关怀、从属性和家庭照料,而这又与“自然母亲”的生育、抚育能力相勾连。

综上所述,无论是作为自然隐喻的“母亲河”,还是作为文化隐喻的“英雄父亲”,都反映出,主流媒体网站部分新闻文本的叙事框架,无意识地复刻着古老的性别分工。这种差异,以及其中蕴含的自然与文化、父亲与母亲的二元对立,并非是这些新闻文本或中国文化特有的现象。美国学者詹妮特·A·克莱妮等人提出,通过将女性与自然归为一类,将男性与文化归为一类,西方男权制的意识形态将男性对女性的贬低、文化对自然的驯服合理化^①。这进一步说明,语言不只是一种沟通的媒介,它还是社会身份建构的重要工具。

而母亲在公共文化叙事中的缺席,一方面是由于既有的社会结构使得母亲更难取得社会意义上的成就,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现有的媒介生态延续了古老的思维方式,在新闻呈现的公共叙事中,女性尤其是母亲,在很多时候是缺席、不被提及的,这被卡罗琳称为“性别数据的缺口”^②。例如,在20世纪上半叶,大批女青年为了性别平等和民族解放投身抗日战争,她们和男兵一样行军转战、参与工作,并且承担妻职和母职^③,是名副其实的民族英雄,但是这样的妇女历史显然被边缘化。弥补性别数据的缺口,正视女性在历史或当下建功立业的能力,在“母亲”与“英雄”“精神”等词汇之间建立新的纽带,这对于还原历史全貌、培育民族精神和提升女性地位等,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二节 “社会母职”的赞誉与性别气质

一、“爱心妈妈”:女性的社会母职

① Kourany, Janet A., James P. Sterba, and Rosemarie Tong, *Feminist philosophies: Problem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Upper Saddle River: Prentice Hall, 1992, p.451.

② [英]卡罗琳·克里亚多·佩雷斯,《看不见的女性》,詹娟译,新星出版社,2022年,第1页。

③ [美]潘以红:《战争从来不只是男人的事业:解读新四军女兵回忆录》,载《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2014年第24期,第83-131页。

在与母亲相关的文本中, TF-IDF 值排名第 14 到第 25 位的词语, 如图 2-2 所示。其中, “服务”“爱心”“社区”三个词语分别出现了 1515 次、1056 次和 1051 次。与此相关的是, 文本中另有“志愿者”一词出现了 720 次, “公益”一词出现了 702 次。这些词语形成了社会服务和公益活动的聚类。对其进行共词分析和文本分析, 可以发现, 与这些高频词相关的文本内容主要分为两类, 一类是以服务母亲为目的的公益活动, 包括健康快车、母亲节慰问、爱心包裹、善款资助等; 另一类则是以“母亲”为参与者的志愿服务活动, 包括帮扶孤困儿童、关爱留守儿童、开展环境卫生整治等, 活动组织者多为各地妇联和社区, 其中, “妇联”一词在文本中共出现了 499 次。从积极的角度来看, 这体现了媒体弘扬社会主义道德的宣传导向, 正视了女性在社会发展和公共事业中的积极作用, 也展现了社会力量对于母亲的尊重和支持。但是, 与此同时, 这种程式化的宣传报道也将母亲的身份与照顾、支持、社区参与等概念紧密相连。

词语	TF-IDF	出现次数
服务	0.002814477	1515
建设	0.00253445	1122
爱心	0.002520985	1056
中国	0.00251713	1252
女儿	0.002467251	1245
进行	0.002388219	1173
社区	0.002357711	1051
生活	0.002279962	1267
黄河流域	0.002239411	623
家庭	0.002236739	1139
儿子	0.002202526	1040
问题	0.002175022	987

图 2-2 母亲相关文本中 TF-IDF 值排名第 14 到第 25 的词汇

进一步分析文本, 可以发现, 在词语搭配中, “爱心妈妈”出现了 559 次, “童伴妈妈”出现了 380 次。其中, “爱心妈妈”代指来自社会各行各业的女性帮扶者, 比如, 桂林市的“周末爱心妈妈”志愿服务团队以女企业家为主体; 封丘县的“爱心妈妈”公益团队则是由社会各界的优秀女性组成, 包括公务员、教师、企事业单位职员、个体经营者等; 另有四川天府新区税务局、湖北省烟草专卖局等单位的女性志愿者也被称为“爱心妈妈”。

这些报道原本是针对爱心活动的“正能量”报道, 但是, 其中呈现了明显的性别角色单一化现象。首先, 这些女性志愿者无论是否婚育, 都被赋予了“母亲”的称号, 借由这种“尊称”, 她们的职业身份被弱化, 社会参与被与母性紧密相连; 其次, 在妇联或企事业单位组织的爱心活动中, 除了带队的主要领导是男性, 承担具体的服务和关怀工作的基本都是女性, 换言之, 女性被与“爱心”“母亲”划上了等号, 承担了某种“社会母职”。

基于对现有新闻文本的深入分析，本文将“社会母职”定义为，女性在社会服务和公益活动中承担的、类似于传统家庭中母亲角色的照料和关怀职责。这些职责不仅包括日常生活的照护，还包括情感关怀、学业支持、社会联结、道德引导等。在“社会母职”的框架下，无论女性的婚育状况如何，她们都被视为天生的照顾者和关怀者，并因此被期望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尽管这一身份常常受到赞誉，但是，基于性别刻板印象的角色赋予和性别分工，实则强化了女性的照顾者身份，限制了她们对社会参与和个体价值的全面理解。

而另一个高频词“童伴妈妈”则来源于中国扶贫基金会开启的“童伴计划”，该计划旨在为每个辐射的村落聘请一位全职的儿童守护专员，进而解决乡村儿童由于监护缺位引发的各类问题，并用“童伴妈妈”这一名词来称呼这些专员。此外，还有医院中的“代理妈妈”，社区的“智慧妈妈”“村童妈妈”“环保妈妈”，就连社区为居民发放的血压计、毛巾等物品也会被称为“母亲邮包”。显然，这里的“妈妈”“母亲”并非指生理意义上的母亲，而是作为爱心人士的代名词出现。这种由家庭领域辐射至公共领域的母性，实则强化了对神圣母职的刻板印象，整个社会默认女性，尤其是成为母亲的女性，天然对所有的孩子和弱小者都有怜悯之心。但是慈善本身是一种个体选择，而非有性别特质的群体分工。即使是留守儿童或者是失去双亲的孤儿，也仍然需要来自“爱心爸爸”的关怀。

然而，无论是在新闻文本，还是在慈善活动的设计中，并没有出现“童伴爸爸”这样的表述，也很少出现“爱心爸爸”，统计结果显示只有6次。在涉及“父亲”的公益事件中，主人公大多会被称为“校长爸爸”“援疆爸爸”“消防员爸爸”“大白爸爸”，而非“爱心爸爸”，其职业身份仍然是强调的重点。而相应的新闻报道也倾向于将父亲塑造为精神引领者而非照护者的角色，比如“受爸爸影响，我也要当志愿者”“在消防员爸爸们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对消防员的工作充满了崇敬和向往”等等。由此可见，性别认知的框架深刻影响着新闻的建构，通过淡化女性的职业身份，强调其如母亲一般的关怀特性，新闻报道在公益领域复现了性别角色和刻板印象。

二、“环保妈妈”：被淡化的公民精神

如果说，在关爱留守儿童等场景中，从孩子的心理需求出发，强调女性的母亲身份，尚且具有部分的合理性。那么，这一名词的泛化，比如“环保妈妈”在文本中出现了144次，则意味着“母亲”的身份内涵不断扩展，她们被期望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但是这种责任又是以家庭话语的形式出现的，伴随着对于家庭价值观和家庭角色的强调，这就构成了一种张力。其结果是，女性公民精神的生长被转译为性别分工的强化。

具体来看，“环保妈妈”这一表达主要出现在广西地区的新闻报道中，它是自治区妇联推动的一项环保实践活动，以改善人居环境为主要目的，也逐渐发展为一个志愿服务品牌，而媒体报道则是对这一话语的复现。从活动本身来看，这有利于推广低碳行为，发挥妇女在乡村振兴和文明城市创建中的作用。但是，将女性献爱心、保护环境、参与社区生活这

类主谓宾结构变成一个合成词“环保妈妈”，在语义上存在着明显的偏差。这一称呼指代的是志愿者，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母亲，她们的职责也并不是“环保”可以概括的。报道显示，这些志愿者的工作内容多种多样，包括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的留守人员提供生活照料、安全教育、就业辅导，在社区开展治安巡逻、排查消防隐患、劝导违停车辆，在乡村进行人居环境整治和生活垃圾分类，清理河边及草丛中的烟头、杂物等等……

由此可见，“环保妈妈”这一称谓，一方面是自治区妇联为了便于活动推广而创造的女性群体代号；另一方面，这个新词汇也传达了一种观点，那就是，母职不仅局限在家庭内部，也延伸到了公共领域。其推导逻辑是，女性要从家庭做起，保持居家环境卫生，进而维护好村屯和城市的卫生，并且参与其他的社区工作。如前文所述，这是社会母职的体现，女性成为了所在社群的母亲，在宣传报道中，她们没有职业身份、个人特征、负面情绪，而是作为抽象的无私奉献的女性群体形象出现，代表了一种社会角色或行为模式。但是，这个逻辑从一开始就不成立，为何维持家庭的卫生，天然就成为了女性的责任？究其原因便是社会对女性的期望仍然受到传统性别角色的限制。同类表达还包括上海市杨浦区妇联推出的“公益妈妈大联盟”，海南省妇联推动的“妈妈环保团”。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女性志愿者集生活照料、环境保护、社区秩序维护、教育与支持等多重职责于一身，其中，每一项服务内容都可以对应特定的职业身份或社会角色，比如：清洁工人、教师、治安监督人员、社会工作者、护理人员等。但是“环保妈妈”的叙事弱化了女性在公共事务中扮演的多重社会角色，将其简化为母性的体现，这就剥离了技能和权利叙事。首先，女性在行事过程中的专业能力，比如沟通协调、卫生清洁、安全知识、紧急情况应对、人道主义关怀等被忽视；其次，将女性在环境保护和社区服务中的贡献视为“母职”的延续，而不是个人基于自由意志、兴趣专长、社会责任感的自主选择，这就限制了女性多元社会身份的完整呈现。

从话语分析的角度来看，“能指”与“所指”的连接并不是随机的，其中存在着特定的社会理由^①，虽然不同个体对于文本的解释是多元化的，活动的组织者也并无主观上的恶意，但是具有特定形式的简单词汇背后，却可能潜藏着已然成为惯习的偏见。具体而言，“环保妈妈”“公益妈妈”或“妈妈环保团”的表述完成了对“女性必然成为母亲”“母亲/女性应该心系公益”等预设的名词化，具体的过程和行为悄然转化为了抽象的存在状态^②，社会性别的意识形态也随之内嵌在话语之中。而随着承载性别偏见的知识、用语、惯习不断流通，又高度道德化，嵌入其中的意识形态也就成为了共识，这又反过来塑造社会现实，维护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而这种习焉不察，恰恰是霸权的体现^③。

第三节 性别失衡的社区服务和无酬劳动

① [英]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殷晓蓉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69页。

② [英]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殷晓蓉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169-170页。

③ 廖益清：《社会性别的批评话语分析述评》，《外语教学》，2008年第5期，第23-27页。

一、社区服务：对母性的推崇与维持

除了前文所述的性别刻板印象和对女性公民精神的淡化,在社区参与和志愿服务中,性别失衡的现象也非常明显。既有研究指出,在我国城市居民的社区参与中,女性的比例大大高于男性^①,社区构建和公共服务都呈现出鲜明的女性化特征,其中的关键原因就在于,以基层群众互助为目标的社区服务,包括亲子关系、家庭教育、养老服务等,高度契合女性家庭照顾者的角色设定,与之配套的项目设计、动员策略和资源分配等也具有鲜明的性别差异^②。这些措施在优化社区治理和鼓励女性走出家门方面,固然是行之有效的,但是对于性别差异的利用也在再生产性别差异,其中的循环机制亟需打破^③。

需要区分的是,社区参与固然是社会参与的一部分,但是二者在目标、方式和范围上有所不同。前者侧重于面向本地社区开展的直接、具体的活动,它通常被认为是“琐碎”“情感性”“生活化”的,而后者则包括更广泛的社会问题解决和公共政策制定层面的参与,常常与经济、政治活动相勾连。研究发现,相较于男性,女性的社会参与整体水平较低,就类型而言,以政策支持类、志愿公益类居多,相较之下,行动组织类、意见表达类的参与则较少,而且女性的社会参与更多地受到家庭生活的牵绊^④。不难发现,政策支持类、志愿公益类的活动正是社区活动的主体。由此可见,在社区治理,尤其是社区公共服务中的单一性别偏向,实则是家庭分工和社会分工的延续,这将女性的活动范围限制在弱政治和生活政治中^⑤。

社区参与和志愿服务的性别差异,在主流媒体网站的报道中有同样的体现,甚至得到了强化。以“爱心”和“社区”两个词语为例,在与父亲相关的6855条文本中,“爱心”在110条文本中出现了141次,以文本条数为基准进行计算,占比为1.6%;“社区”在185条文本中出现了290次,占比为2.7%。而在与母亲相关的9515条文本中,“爱心”在473条文本中出现了1056次,占比为5.0%;“社区”在567条文本中出现了1051次,占比为6.0%。数据表明,相较于父亲,在新闻文本中,母亲被更多地与社区、志愿服务联系在一起。这并非偶然。研究指出,在包括学校、福利机构、健康中心等在内的社会组织中,母性(motherhood)发挥着核心作用,相关机构通过将“照顾者”的角色分配给女性,间接地塑造和维持了母性的标准^⑥。这种现象反映出家庭与社会机构在性别角色分配上的同构性,以及社会对于性别

① 陈文:《城市居民社区参与中的性别失衡——基于武汉市百步亭社区的个案研究》,《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第84-89页。

② 张文华、宋婷、秦小峰:《城市社区微治理中多元主体协同的博弈困境与女性参与》,《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23年第5期,第83-89页。

③ 张静敏、陈业强:《性别化策略:对城市老年人社区参与性别差异的解读》,《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第137-143页。

④ 李升、任伟榕、黄德远:《“家庭牵绊”还是“工作引拉”?——中国女性的社会参与及其影响因素研究》,《Social Sciences in China》,2020年第1期,第133-158页。

⑤ 刘建军、张兰:《社区社会资本的性别化积累》,《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第24-32+236页。

⑥ David, Miriam E. "Motherhood and social policy-a matter of education?." *Critical Social Policy* 4.12 (1984): 28-43.

角色的深层次期望。其结果是，女性获得了更多照护和养育方面的知识和经验，进而能够与孩子建立更牢固的关系，而这往往又会被归因为“母亲和孩子的天然联系”而非刻意练习的结果，照护和养育也随之被视为一种性别天赋^①，这是社会的性别期待实现和强化的过程。

二、无酬劳动：对家务劳动的延续

除了对于母性的塑造和推崇，这些公益活动的特殊之处还在于，它们在性质上与女性承担的家务劳动是相似的，都属于无酬劳动。无酬劳动是指个人在没有获得任何经济补偿的情况下为他人或社区提供的劳动，包括清洁卫生、洗衣做饭、照顾儿童和老人以及社区的志愿服务等，Hirway 认为，无酬劳动在两性中的分配不均性别不平等的根源^②。

在宏观经济学的视域下，无酬劳动具有生产商品和服务的能力，因而能够和经济的其他部分联系起来^③。具体而言，无酬的家务劳动为家庭成员提供修复支持，降低了劳动力再生产和企业用工的成本，这是对于商业部门的补贴；而无酬的公益活动发挥着基础设施的作用，则是对原本应由公共部门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补位^④。换言之，社会再生产以及公共服务的部分成本都通过无酬劳动的形式转嫁给了女性。《2023 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显示，在中国，两性在无酬家务及照护工作上花费的时间比例大不相同，其中，女性投入的时间比例为 15.35%，而男性仅为 5.9%^⑤。社会学家丹尼尔斯也将家务、志愿者工作等称为“隐形工作”，因为这些工作往往受到轻视，并且在文化和经济价值上贬值^⑥。

虽然在家庭领域，主流媒体网站的报道显示，随着社会性别观念的进步，家务劳动有了一定的社会可见度，被纳入了关于政策和法律的考量，比如《“家务劳动补偿”呵护婚姻关系公平》《蒋宇霞：提供家务社会化替代 助女性参与公平职场竞争》《家务劳动亦应获得价值认可》等。但是，进一步分析与父亲、母亲有关的新闻文本，可以发现，家务及其同义词，包括家务活、操持家务、家务劳动，一共出现了 98 次，其叙事框架基本可以总结为：父亲在外工作，母亲操持家务并兼顾农活、零工、照护等，孩子帮助母亲分担家务。其中，仅有一篇关于“东方女化学家”程春生的报道，打破了传统的性别分工，提到“我爸既要当好医生又要做好家务和后勤保障”^⑦。这反映出新兴观念和媒体报道、实际行动之间的分歧。

① Cowdery, Randi S., and Carmen Knudson - Martin. "The construction of motherhood: Tasks, relational connection, and gender equality." *Family relations* 54.3 (2005): 335-345.

② Hirway, Indira. "Unpaid work and the economy: linkage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Indian Journal of Labour Economics* 58.1 (2015): 1-21.

③④ Antonopoulos, Rania. "The unpaid care work-paid work connection." *Levy Economics Institute, Working Papers Series* (2008).

⑤ World Economic Forum: "Global Gender Gap Report 2022", <https://cn.weforum.org/reports/global-gender-gap-report-2023>, 2023 年 6 月 20 日.

⑥ Daniels, Arlene Kaplan. "Invisible work." *Social problems* 34.5 (1987): 403-415.

⑦ 人民网:“东方女化学家”程春生:筑牢精细化工安全屏障, <http://edu.people.com.cn/n1/2021/1204/c1006-32299501.html>, 2021 年 12 月 4 日.

而在公共领域，虽然公益行为本身值得推崇，但是将其与母性结合并且过分地道德化、天然化，单一倡导并报道女性的社区服务行为，并使用“XX 妈妈”的固定搭配，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的负面影响。一方面，这会加深性别刻板印象，影响女性的自我认知，鼓励她们认同传统观点，即女性具有关心他人的天性，其自身的价值就在于自我牺牲。因而，她们可能会放弃基于自身的兴趣、能力进行选择的权利，相应地，整个社会也会倾向于忽视女性在其他领域，比如职场、政治参与方面的能力和贡献。

另一方面，将公益行为单一性别化，也会加剧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劣势地位。研究表明，职业和行业中的性别隔离与女性长期从事无酬照护类的工作有关^①，如前文所述，家务劳动和社区服务都属于此类。这种性别隔离与由来已久的惯习和认知误区有关。过去，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在市场经济下，以家务劳动为代表的无酬劳动并不是生产行为，而是消费行为，是免费和无限的^②，因而其实际价值和相关技能常常被低估。虽然宏观经济学家澄清了无酬劳动的生产性、有限性和成本^③，却未能改变大众的固有认知和生活经验。而当传统意义上由女性主导的工作内容进入市场领域，比如行政、保洁、家政、照护等岗位，女性普遍也只能拿到较低的薪水。不仅如此，职场中的女性还会被要求承担更多岗位职责以外的“办公家务”^④，比如组织会议、记录会议内容、整理公共区域的卫生等。这种工作中的从属地位又强化了妇女在家庭中的从属地位。因而，剥离女性与无酬劳动的单一性别联系，打破照护类工作低价值、低技能、无限、免费等刻板印象，正是破除职场性别隔离的必要条件。

此外，包括社区服务在内的无酬劳动的增加也意味着有酬劳动时间、自我增值能力的减少，这使得女性更难获得高薪工作所需的专业技能、经验和竞争力，从而被锁定在基础性、低薪资的工作中，这种“时间税”加剧了女性的收入贫困和时间贫困^⑤。以安徽省居民为样本的研究显示，安徽省的男性居民一天中有 5 小时 19 分钟在从事有酬劳动，而女性只有 3 小时 21 分钟。该研究也将公益活动纳入了无酬劳动的统计范围，并且指出，对于月收入在 2 万元以下的女性而言，有酬劳动时间与收入之间基本呈现正相关关系^⑥。

我国向来推崇集体主义，鼓励为他人服务，但是，讨论女性的无酬劳动和志愿服务，其目的并不在于否认“无私奉献”是一种高尚的品质。问题在于，在特定的情境下，这种期望是否平等地适用于所有人，还是只针对女性？从公益相关报道与女性、母亲身份的强关

① Antonopoulos, Rania. "The unpaid care work-paid work connection." *Levy Economics Institute, Working Papers Series* (2008).

②③ Hirway, Indira. "Unpaid work and the economy: linkage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Indian Journal of Labour Economics* 58.1 (2015): 1-21.

④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Research: Women Leaders Took on Even More Invisible Work During the Pandemic", <https://hbr.org/2021/10/research-women-took-on-even-more-invisible-work-during-the-pandemic>, 2021.10.13.

⑤ Hirway, Indira. "Unpaid work and the economy: linkage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Indian Journal of Labour Economics* 58.1 (2015): 1-21.

⑥ 孙悦：《安徽：女性时间都去哪儿了？》，《四川省情》，2019 年第 7 期，第 39-40 页。

联性，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着明显的性别不平等。根据麦肯锡管理咨询公司的估计，世界上 75% 的无偿工作都由女性承担，而女性从事的无偿护理工作的产值相当于全球 GDP 的 13%^①。因此，整个社会必须正视无酬劳动的实际价值，促进男女在家庭以及社区责任方面的平等分担，并且确保两性都在慈善和志愿工作中得到足够的资源和支持。

第三章 作为生育主体的母亲

前文所述的自然母职和社会母职，都是基于文化意义展开的对于母职的探讨，这一章将基于生育母职，即母亲在受孕、生殖、抚育、教育子女时所需承担的职责展开。Ann Oakley 曾经提出关于传统母亲角色的四种广泛流传却无法证实的社会迷思，具体包括：女人做母亲是自然的，每一位女性都想成为母亲；所有女性都能够从母亲角色中获得快乐；母亲是孩子的最佳照顾者；全职母亲对于孩子最有利^②。而女性主义对生育的看法则有两个基本组成，其一是明确承认女性有权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去理解生活并采取自主自决的行动，其二是，对妇女的赋权可以推动社会变革和性别平等^③。

基于这四种迷思和两个面向，本文试图厘清女性主义视域下的生育母职。首先，生育不应该被视为女性的天职，个人有权选择是否生育、何时生育以及如何生育（如自然分娩、剖腹产、合法的辅助生殖技术等），应当尊重多元的家庭模式，包括单身母亲、不生育的夫妻等。其次，社会应当正视母职所伴随的潜在痛苦，包括分娩疼痛、哺乳疼痛、产后抑郁、养育压力等，对于那些有生育意愿的女性，社会应当在产假、哺乳、照护、医疗服务、教育资源等方面，提供足够多的育儿支持；再次，应当倡导男性和其他家庭成员参与生育、养育、教育的全过程。最后，要将女性的价值和身份从生育能力这一单一维度中解放出来，消除家务劳动和社会分工中的不平等。本章对于新闻文本中生育母职建构的考察，也将以此为基准展开。

第一节 生育自由与生命政治

一、生命政治与被管理的女性身体

福柯指出，现代权力机制运行的合法性基础已经由无条件的生杀予夺转向了“让人活着”或者“不让人死”，这就开启了“生命政治”的时代^④。在生命政治的视阈下，社会借助微观的

① Anna Louie Sussman: "How to Value Unpaid Care Work: The \$10 Trillion Question", <https://www.newsecuritybeat.org/2018/10/unpaid-care-work-10-trillion-question/>, 2018.10.11.

② OAKLEY A. *Woman's work: The housewife, past and present*,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6. 转引自俞明雅:《教科书中的母职叙事——以 X 版小学语文教科书为中心的考察》,《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0 年第 4 期,第 58-64 页。

③ McDaniel, Susan A. "Toward a synthesis of feminist and demographic perspectives on fertility."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37.1 (1996): 83-104.

④ [法]米歇尔·福柯著:《性经验史》,余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第 87-90 页。

权力机制,比如健康水平、社会福利系统、医疗机构、人口统计、生活方式等,实现了对于个人身体和社群人口的管理^①。就此而言,生命政治可以被理解为从国家层面对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健康状态等进行调节,以促进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维持社会秩序的一种自由主义思潮下的治理术^②。

福柯认为,相较于传统的政治哲学,“生命权力”虽然有压制、惩罚、控制等否定性的面向,但是它同样蕴含着生产性的面向,在他看来,对于生命的积极干预有利于主体的自我建构与潜能的发挥^③。此外,他也提出,对于现代国家而言,“整体人口的安全而非个体的安全才是国家治理的着眼点”^④。但是,这样的国家干预也遭到了新的质疑。一方面,在女性主义的视角下,生命政治是一套高度性别化的统治模式,它以全体人口利益最大化为名,干预女性的生育,也固化了女性作为次要劳动力的从属地位^⑤。另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的视角下,生命政治是资本主义逻辑的产物,它将经济利益作为伦理秩序的衡量尺度,既没有赋予个体更多的人权和自由,也没有促进人类的解放^⑥。

这里需要澄清的是,虽然福柯“生命政治”“生命权力”的概念是基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提出的,但是本文认为,在现代化的大背景下,生命政治的某些原则和机制在不同的社会政治条件下仍然适用,只是表现形式有所不同。此外,在学术论文中,这一概念在中国语境下的运用早有先例。因而,本文暂且搁置可能存在的意识形态分歧,仍然沿用这一概念,用以代指现代国家对于人口和个人身体的管理。

有学者认为,在中国,生命政治是在一个由“人口、素质、领土和民族”定义的“问题空间”中运作的^⑦。可以说,无论是计划生育还是鼓励生育,其实质都是国家对于人口生产资源和权利进行的权威性分配^⑧,都是生命政治的体现。由于在特定区域内保护个人身体和社群人口的安全状态,被视为现代国家存在的重要理由^⑨,因此,生命政治成为了现代国家管理的基本组成,在当前的社会阶段,因为潜在的否定性面向而摒弃生命政治是不切实际的。关键在于,社会主义的中国需要怎样的生命政治?

政治被视为社会成员借助公共权力来确认并保障自身权益的一种社会关系^⑩,然而,在

① [法] 米歇尔·福柯著:《必须保卫社会—法兰西学院演讲系列 1976》,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年版,第 186-188 页。

② 郭伟峰:《福柯与阿甘本生命政治理论的根本区别——基于“生命”概念的视角》,《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9 年第 1 期,第 136-143 页。

③ 苗翠翠:《生命政治学研究的三个基本问题及其路径重构》,《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23 年第 6 期,第 16-28 页。

④ 吴冠军:《生命政治:在福柯与阿甘本之间》,《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 年第 1 期,第 93-99 页。

⑤ 吴家丞、戴雪红:《生命政治论的女性主义解读——以权力的三重向度为视角》,《国外社会科学》,2022 年第 4 期,第 171-181+200-201 页。

⑥ 闫培宇:《为什么生命政治行不通——对生命政治的崛起、繁荣与困境的再思考》,《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3 期,第 113-119+129 页。

⑦ Greenhalgh, Susan. "The Chinese biopolitical: Facing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Genetics and Society* 28.3 (2009): 205-222.

⑧ 周长友:《生育政治—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权力与技术》,华中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20 年。

⑨ 张丽屏、王丰龙、刘云刚:《人口、治理与政治地理学:生命政治研究综述与展望》,《人文地理》,2019 年第 1 期,第 46-53+105 页。

⑩ 王浦劬:《政治学基础(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 3 页。

资本主义逻辑下，政治权力的规训和性别统治，使得个体的存在方式被国家运行的轨道所定义，从而产生异化现象，女性的身体、劳动力及其意识形态也受到权力的掌控^①。与之相对的是，马克思认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②，这一观点为生命政治的建构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在马克思主义的视域下，生命政治应当以“有生命的个人”为前提^③，尊重个体的权利与尊严，规避资本逻辑之下人的生命与经济的异化关系。而从女性主义出发，生命政治和母职建构都应当尊重女性的权利和选择，为其提供必要的社会支持和资源，并且消除基于性别的刻板印象和社会分工的不平等。

二、生育自由与不做母亲的权利

伴随着中央权力的集中和国家身份的建构，近代民族国家的诞生实则确立了基于“国家理由”对人口进行大规模调控的原则^④，其中的杠杆包括生育政策、移民政策、经济激励、文化宗教因素等等。而探究生育母职建构的第一步就在于，在生命政治和生育调控之下，女性是否真正拥有生育自由？生育自由包括两个面向，即生育的权利和不生育的自由^⑤。考虑到母职作为一种父权制意识形态的文化强制性，这里着重关注的是“不生育的自由”，即不做母亲的自由。这种自由既体现为法律赋予的权利，包括对生育代价的知情权、堕胎权、避孕的权利等，也包括社会意识形态对此持有的包容性认知和评价。如果来自社会、家庭、文化的生育压力不能得到有效缓解，那么，即便在政治和法律层面认可不生育的自由，这种自由也只能是一种表面的、政治性的口号或策略，而不是切实可行的选择。

19世纪后期，西方的女权主义者提出“自愿成为母亲”的权利诉求，推动了现代意义上的生育权观念的形成，此后，这一权利也得到了国际会议文件的确认^⑥。《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五十一条明确规定，妇女有不生育的自由^⑦。但是，由于长期受到父权制文化的权力压制和知识规训^⑧，女性并未真正获得法律允诺的生育自主权，而是主动或被动地遵循陈旧的生育观念，比如“多子多福”“重男轻女”等。除了传统文化的束缚，近年来，基于对人口负增长的忧虑，女性的低生育意愿显然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公共问题”，生育价值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在这个过程中，生命政治积极发挥着调节作用。如果要探究现行的生命政治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视域下的“应然状态”，便需要审视具体

① 于天宇、王帅帅：《资本逻辑批判与生命逻辑建构——乔尔·科威尔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生命政治意蕴》，《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12月7日，第1-12页。

②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页。

③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9页。

④ 周长友：《生育政治—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权力与技术》，华中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20年。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编 婚姻家庭，https://www.spp.gov.cn/spp/ssmfdyflvdtg/z/202008/t20200831_478417.shtml，2020年8月31日。

⑥ 田海平：《论生育伦理的中国难题与道德前景》，《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年第3期，第178-186页。

⑦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护法》，https://www.gov.cn/guoqing/2021-10/29/content_5647634.htm

⑧ 王慧：《福柯话语理论视域下的性别话语转向》，《文艺评论》，2015年第3期，第17-21页。

的调节机制。

福柯的生命政治理论涉及三种调控人口的干预机制,包括人口知识的生产、干预政策的实施和目标人口对于相应知识、条例的内化,其中,人口知识的生产主要指经由专家判断、法律草案、媒体观点等形式生成的真理、观念^①。基于此,本文着重考察的便是媒体建构的“真理”是否存在不合理的预设或性别偏见。

需要澄清的是,本文的立论基础虽然是性别不平等对于女性生育意愿的抑制,并且正视人口负增长蕴含的社会风险。但是本文并不认为生育是女性的默认选项和社会责任,也不认为生育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唯一解决方案。在女性主义的视域下,只有当自愿的不生育行为同样被视为有价值的人生选项,母性才能够成为一种选择而非强制^②;反之,女性就会沦为整个社会的生育工具,这是性别压迫的延续,与价值理性、性别平等和人类解放是背道而驰的。基于这一认知,本文对主流媒体网站的生育母职建构展开进一步的考察。

以“生育”为关键词在“人民网”进行检索,并抓取相关的新闻报道,截止到2023年8月6日,共获取2664条数据,其中,“生育意愿”一词共出现389次,显示出媒体对这一议题的高度关注。利用“微词云”对其进行共词分析可以发现,“生育意愿”的左邻词多为“提高”(30次)“提升”(18次)“释放”(7次)“增强”(3次),涉及的机构团体包括国务院(27次)、党中央/中共中央(22次)、全国政协(16次)等,这反映出国家机器对于扭转低生育率的积极态度。略有不同的是,另有两篇报道援引人口专家和人大代表的意见,提到“在尊重个体生育意愿的基础上完善公共服务”^③“积极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尊重已婚育龄群体自身意愿”^④。而“尊重”二字反映了在个人选择与社会需求之间寻求平衡的重要性。

当下,整个社会的生育观念正在发生个人化、女性化和成本化的转向^⑤,而对生育自主的追求不仅挑战了传统文化的成见,也对人口知识的普及和人口政策的统筹提出了新要求。而在一个理想的生育友好型社会中,每个人都有权获取充分的信息、资源和发展机会,并且基于自身的需求和价值观念做出生活选择。因此,对于那些有生育意愿的群体,社会应当为他们提供充分的经济支持、便利的育儿基础设施等,尽可能降低托育、养育、教育的成本;而对于那些不愿生育的人群,社会不应当只有“提升生育意愿”这一条路径,同样也需要尊重个体的选择。

具体而言,在理念层面,社会应当支持多元的家庭模式,包括单亲家庭、无子女家庭等,提高公众对于生育权和避孕知识的认知水平;在政策层面,政府应当为育龄群体提供

① 张丽屏、王丰龙、刘云刚:《人口、治理与政治地理学:生命政治研究综述与展望》,《人文地理》,2019年第1期,第46-53+105页。

② Russo, Nancy Felipe. "Overview: Sex roles, fertility and the motherhood mandate."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4.1 (1979): 7-15.

③ 人民网: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 尊重个体生育意愿,转载自《中国青年报》,2021年2月3日,<http://yn.people.com.cn/n2/2021/0203/c372441-34561918.html>

④ 人民网:四川省人大代表钟小红:拓宽已婚育龄女性生育意愿意见征集渠道,2022年1月21日,<http://sc.people.com.cn/n2/2022/0121/c379469-35106596.html>

⑤ 王慧、叶文振:《中国生育观念的变迁与启示》,《福建江夏学院学报》,2023年第3期,第68-74页。

全面的福利支持和医疗服务，包括避孕服务、孕前和孕后的健康咨询以及心理情感支持等。只有在一个全面尊重和支持个体生育决策的社会中，母职作为一种社会使命的思维才可能受到挑战，与之相关的性别刻板印象、母职神话和性别分工才可能被消除。

三、人口知识与科学的政治化

前文论述了“尊重生育意愿”是生育自由的应有之义，但是，在积极倡导生育的当下，从主流媒体网站的报道来看，社会对于生育意愿的尊重程度显然是不足的，如前文所述，虽然有两篇报道提到了“尊重生育意愿”，但是，总体而言，这一观点出现的频率屈指可数。相关内容只是作为专家的多项观点之一，在文中或文末稍加提及，篇幅较短，并非报道的重点，且只在新闻标题中出现过一次。

那么当前主流媒体网站对于生育自由所持有的观念是怎样的呢？针对以“生育”为检索词获取的文本进行分析，在自定义词典中加入“二孩”“三孩”，可以发现，TF-IDF 值排名前十的词语包括：政策、人口、家庭、发展、三孩、支持、女性、子女、服务、社会。

词语	TF-IDF	出现次数
政策	0.006105074	3369
人口	0.005601206	1696
家庭	0.005037734	1589
发展	0.0044989	1567
三孩	0.004409909	1091
支持	0.004363253	1454
女性	0.004279054	840
子女	0.004237965	841
服务	0.004162439	1302
社会	0.003392401	805

图 3-1 生育相关文本中 TF-IDF 值排名前十的词汇

分析原文可以发现，相关的新闻报道高度服务于当前的“三孩政策”，其核心思想是：完善配套政策，提升生育意愿。虽然相关报道强调了生育的社会面向，逐步与发达国家接轨；但是总体而言，媒体宣扬的生育观念较为单一、对于生育知识的普及具有明显的倾向性。例如，2022 年 9 月 25 日，人民网-上海频道报道了“世界避孕日”主题研讨活动。这一纪念日原意是提高年轻人在生育决策中的自主性，帮助他们在知情和自由的前提下做出选择，避免意外怀孕。但是从报道的内容来看，这次“世界避孕日”研讨活动的主题是“推进生育力保护 助力家庭健康幸福”，专家关注的是“青年群体的生育力保护”，强调婚育观念与“三孩政策”的适配^①，规避了原本的避孕和生育自主权议题。虽然这次研讨活动并非由媒体直

^① 人民网:多措并举推进生育力保护 这个“避孕日”聊聊“生”,2022 年 9 月 25 日,

接组织，但是媒体的把关与报道本身就体现了自身的倾向性。

通过百度引擎进行站外检索可以发现，2022年9月26日，上海市浦东新区同样组织了以“为爱守护，孕育健康”为主题的世界避孕日宣传活动，其活动内容更符合“世界避孕日”的原始理念，比如引导正确避孕、倡导生育间隔观念、预防意外怀孕等^①，但是并没有被人民网报道，只是作为政务信息在澎湃新闻发布。而在2023年，人民网没有报道任何与“世界避孕日”有关的新闻。这意味着，主流媒体网站会根据“释放生育潜能”的政策导向^②来判断特定人口知识所具有的新闻价值，同时推广与生育政策相协调的社会观念。

从舆论宣传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在“鼓励生育”方面自有其合理性。但是，就社会的良性发展而言，单一的报道视角可能会限制公众对于生育知识和多元生育观念的理解，而这些信息对于国民健康和个人福祉同样重要。在女性主义的视域下，对女性生殖活动的控制实则降低了女性的流动性，使其在很大程度上被限制在家庭领域^③，因而，自由避孕、堕胎和节育知识不仅是生育健康的重要组成，也被视为克服父权制、逃离社会角色束缚的重要工具^④。

再比如，有多篇报道援引专家观点，强调晚生育、不生育、减少哺乳等会增加女性罹患乳腺癌的风险，相关报道集中出现在2023年。但是，乳腺癌的危险因素存在种族、地域、生活习惯的差异^⑤。早在2011年，就有针对中国8个省市女性的研究指出，是否生育和哺乳时间长短等因素与中国女性乳腺癌的发病率并没有显著的相关性^⑥。2017年深圳地区的研究也没有发现生育与乳腺癌有关^⑦。北京地区的研究指出：生育次数越多，乳腺癌患者的生存率反而越低^⑧。另有区分族群的研究指出，增加分娩次数可以降低马来西亚人绝经前患乳腺癌的风险，但是不会降低华人女性的风险^⑨。由于医学界对生育与乳腺癌的关系尚存争议，新的研究结果也在不断涌现，本文无意于此下定论。但可以明确的是，二者的关系有复杂的面向，现阶段媒体只展示了其中一个维度，即：生育能够降低患乳腺癌的风险。

这些案例表明，专家、媒体协同进行人口知识的生产，并且将避孕与生育力保护、生

<http://sh.people.com.cn/n2/2022/0925/c134768-40138678.html>

① 浦东卫生计生：为爱守护，孕育健康|浦东新区开展2022年世界避孕日主题宣传活动，2022年9月26日，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20071416

② 新华社：《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https://www.gov.cn/zhengce/2021-07/20/content_5626190.htm，2021年7月20日。

③ Gupta, J. A. *New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 women's health and autonomy: Freedom or dependency*,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2000, 88.

④ Pavard, Bibia. "The right to know? The politics of information about contraception in France (1950s-80s)." *Medical History* 63.2 (2019): 173-188.

⑤ 刘丽媛：《女性乳腺癌危险因素及风险评估模型的流行病学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16年。

⑥ 徐雅莉、孙强、单广良、张瑾、廖海波、李世拥、姜军、邵志敏、蒋宏传、沈念春、石岳、尉承泽、张保宁、陈妍华、段学宁、李波：《中国女性乳腺癌发病相关危险因素：病例对照研究》，《协和医学杂志》，2011年第1期，第7-14页。

⑦ 刘保华、万舰、余婉燕、朱彩霞、王琮、黎金钱、陈书恩：《乳腺癌危险因素调查分析》，《河南医学研究》，2017年第21期，第3844-3847页。

⑧ 余一雯、李贺、曹巍、左婷婷、杨雷、王宁、陈万青：《不同生育史的女性乳腺癌患者临床特征及预后分析》，《中国肿瘤》，2021年第12期，第947-952页。

⑨ H. Verkooijen et al. "Multiparity and the risk of premenopausal breast cancer: different effects across ethnic groups in Singapore." *Breast Cancer Research and Treatment*, 113 (2009): 553-558.

育与健康进行新的意识形态接合^①，从而推动社会生育观念的转向。但是高度服务于政策需要的人口知识生产，实则体现了科学的政治化和政治的科学化，其结果是政策合法性的降低与科学权威性的丧失^②。如果媒体没有对于生育的益处和潜在风险都做出公允的告知，那么女性的知情权和生育决策权实则受到了侵害，她们获取这些知识的隐性门槛也会抬高，这就意味着女性不生育的自由受到了意识形态的限制，而限制女性对于生育的控制力，实则是改变妇女地位的最大障碍^③。

既有研究指出，在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越高，在生育决策方面更有话语权，其子女的数量就越少^④。如前文所述，这些研究只能揭示在特定的社会环境或社会阶段下，女性地位与生育率的相关关系，却无法交待因果关系。但是这一研究至少表明，“每个女性都天然想成为母亲”显然是一种模糊的预先假设，是在暗示一种规范性^⑤，即女性应当成为母亲。否则，拥有更高社会地位、在生育养育子女方面更有优势的女性为何不愿生育？面对这一悖论，一个常常被忽视的反向逻辑是，在一个鼓励生育的社会中，女性要想突破社会限制，掌握对生育的控制能力，这高度依赖于她们所拥有的经验和资源，其中，自主权和成就导向尤为重要^⑥。

换言之，当女性拥有自由选择权或者对自身处境、规划有更清醒的认知时，她们可能会放弃生育这一并不愉快的生命体验，其中伴随着孕吐、漏尿、妊娠纹、分娩疼痛、涨奶等一系列的生殖代价，以及承担更多家庭责任、放弃自我实现的发展代价。但是，那些陷于贫困、无法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可能无法了解相关的信息，从而在对生育代价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盲目成为母亲，这也为更多的家庭悲剧埋下了隐患。因此，当讨论“不做母亲的自由”时，首先需要承认，各阶层的女性都有权从大众媒体获得充分的关于生育风险的提示，并且基于此做出知情选择。此外，只有当这些体验被大众知晓、接纳，更多的医疗资源和社会资源才能够被投入其中，去关注女性的身心健康和发展需求。但是，很明显，现阶段“女性天然就会成为母亲”的迷思仍然广泛存在。

第二节 “神圣母职”与被掩盖的女性主体

一、“幸福母亲”与生育无知

关于母亲的另一大迷思是：所有女性都能够从母亲角色中获得快乐，这实则是社会建

① 徐德林：《接合：作为实践的理论与方法》，《外国文学评论》，2013年第3期，第139-161页。

② Weingart, Peter. "Scientific expertise and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paradoxes of science in politics." *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 26.3 (1999): 151-161.

③ Russo, Nancy Felipe. "Overview: Sex roles, fertility and the motherhood mandate."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4.1 (1979): 7-15.

④ 石智雷、杨雨萱：《女性权益、社会地位与生育选择：相关文献评述》，《人口学刊》，2019年第1期，第31-44页。

⑤ [英]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殷晓蓉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171-172页。

⑥ Russo, Nancy Felipe. "Overview: Sex roles, fertility and the motherhood mandate."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4.1 (1979): 7-15.

构的产物。历史学家约翰·R·吉尔斯指出,在14世纪,受宗教信仰的影响,母性仍然是“苦难”的象征,这一形象与亚当和夏娃所受的“伊甸园诅咒”有关^①。在《创世纪》中,作为偷吃禁果的惩罚,上帝告诉夏娃,她将在怀孕和分娩的过程中经历痛苦和忧伤,并且受到丈夫的管束^②。而在维多利亚时期,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性别分工,父亲离家工作,母亲留在家中照顾孩子,在剧烈的社会和经济变革中,由父亲塑造和主导的大家族(household)走向消亡,而由无时不在、自我牺牲的母亲主导的核心家庭(family)则获得了胜利^③。母亲在生育、养育中承受的“痛苦”被赋予了极高的社会价值,并且被神圣化。

相较之下,在中国,对于牺牲和奉献的推崇可以追溯到先秦儒家的祭祀传统和道德教化^④。在家庭主义之下,母亲牺牲的话语是触发子嗣孝道的重要因素^⑤;在近代民族解放的背景下,为国养子更是胸怀大义的体现。由此,牺牲和幸福这一组情感色彩原本相反的词语,便在歌颂式的话语体系下,成为了一体两面的存在,“幸福母亲”也逐渐成为了一种主导性的意识形态,它暗示:好母亲就是心甘情愿为孩子付出、并且感到幸福满足的母亲,母性不应该和痛苦混杂在一起^⑥,否则就是不成熟、不称职的表现。然而,从整个社会的运转来看,美化母亲的话语与社会对无偿的再生产和护理劳动不断增长的需求是并存的^⑦,尊重母亲的观念也往往伴随着对母亲实际困境的忽视^⑧。时至今日,这种“幸福母亲”的意识形态仍然在延续,并且限制了女性对于负面经验的表达,其中的典型代表便是对分娩疼痛和生育并发症的“沉默”。

通过“微词云”对人民网“生育”相关的文本(截止到2023年10月18日)进行情感分析,可以发现,7成以上(72.69%)的词汇为正面情感,仅有1成左右(10.48%)的词汇体现了负面情感,高频的负面词包括:问题、负担、风险、压力、后顾之忧等,相关报道强调这些都是政策着力解决的问题,使用的多是“解职工生育后顾之忧”“减轻压力”“预防出生缺陷”等积极的措施性表达,符合正面宣传的基调,但是这种报道方式显然掩盖了生育层面许多的微观问题。

为了探究主流媒体网站的报道与女性自主表达的差异,本文拟采用社交媒体“小红书”的内容进行对比。作为一个典型的女性社区,不可否认,小红书深受消费主义、流量逻辑的影响,但是其用户画像显示,平台聚集了大量新手宝妈,有7成用户为90后,50%分布

① Gillis, J. R. *A world of their own making: Myth, ritual and the quest for family valu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160.

② 《新旧约全书》,中国基督教协会印发,1989年,南京,第3页。

③ Gillis, J. R. (1996). *A world of their own making: Myth, ritual and the quest for family valu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87.

④ 龙佳解:《论先秦儒家的祭祀思想》,《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第87-92页。

⑤ Leung, Janet TY. "Perceived parental sacrifice, filial piety and hopelessness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s: A cross-lagged panel study." *Journal of Adolescence* 81 (2020): 39-51.

⑥ Held, Lisa, and Alexandra Rutherford. "Can't a mother sing the blues? Postpartum depress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otherhood in late 20th-century America." *History of psychology* 15.2 (2012): 107.

⑦ McDaniel, Susan A. "Toward a synthesis of feminist and demographic perspectives on fertility."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37.1 (1996): 83-104.

⑧ Gillis, J. R. (1996). *A world of their own making: Myth, ritual and the quest for family valu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76.

在一二线城市^①，因而本文认为，这一平台的内容能够部分反映年轻女性的观点。同样截止到 2023 年 10 月 18 日，通过抓取小红书“生育”话题下的笔记，一共得到 437 条数据，这一份文本中，仅有 45.08% 的词汇体现了正面情感，26.09% 的词汇为中性情感，另有近三成的词汇体现了负面情感。其中，高频的负面情感词汇包括：离婚、失业、抑郁、害怕、痛、害羞、焦虑等，相较之下，意象更为具体、情感色彩也更加鲜明。

通过对比正文，可以发现，在关于生育的描述中，小红书的笔记大多直接叙述了女性的生理或心理感受，比如新手妈妈对疼痛的羞耻感、宫缩的疼痛、哺乳的不适、孕晚期的耻骨疼痛、剖腹产的挑战以及进产房的尴尬经历等，这些表达突出了女性作为感受主体的视角。相较之下，人民日报的报道则采用了一种更为官方和科学化的叙述方式，规避了对于女性生育体验、疼痛和损伤的直接叙述。它更多地从政策导向、科学话语和以胎儿为中心的角度出发，强调各种干预手段能够减轻女性的痛苦，并且呼吁女性积极承担起育儿责任。这体现了费尔克拉夫所强调的“言辞表达的力量”，包括承诺、要求、威胁等^②，在这里，“威胁”表现为：如果母亲做了或不做哪些事情，对孩子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并暗示这样是不称职的。

例如，在与孕吐相关的报道中，新闻标题并不直接提及孕妇，而是聚焦胎儿或应对方案，例如：“孕期牙疼会影响胎儿吗”“孕吐会影响胎儿健康吗？”“缓解孕吐的方法有哪些？”至于与分娩疼痛相关的报道，则着重强调无痛分娩的推广，鲜少涉及女性对于生理体验的直接、具体的表述，只是作为背景材料偶有提及。然而，无痛分娩并不能够消除疼痛，只能缓解疼痛，也并非人人适合^③，且由于无痛分娩普及程度有限，目前仍有七成女性深受分娩疼痛的困扰，疼痛级别可以达到 8-9 级^④。换言之，分娩疼痛依然是孕妇面对的重大问题，情形并不乐观。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与生育体验相关的“报道”实际上多为人民网“健康”板块的科普内容，因而多以科学话语和专家建议为主，鲜有记者亲临一线采访所得的孕产妇经验。可以说，在打造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当下，主流媒体网站在观念上强调尊重女性，但是对作为生理过程的生育行为却显现出鲜明的回避态度。这背后的原因大抵有三点。首先，受到植根于传统文化的禁忌影响，生育过程常常被视为私人体验和敏感话题，因此，它往往不会被置于公共领域加以讨论；其次，在鼓励生育的社会背景下，媒体倾向于避免详细描述生育过程中的痛苦和风险，以免引起育龄妇女的担忧或恐惧；再次，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孕

① 千瓜数据：《2022 年千瓜活跃用户画像趋势报告（小红书平台）》，2022 年 3 月 29 日，<https://www.qian-gua.com/blog/detail/1591.html>

② [英]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殷晓蓉译，华夏出版社，2003 年版，第 70 页。

③ 林爱宝：生孩子究竟有多痛？正确认识分娩疼痛，2016 年 6 月 5 日，<https://obgyn.dxy.cn/article/495155>

④ 澎湃新闻：七成女性仍受分娩之痛，无痛分娩普及到底难在哪儿？2023 年 10 月 1 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4892205

妇的身体经验不断屈从于医学话语的建构^①，换言之，科学解释居于主导地位，孕妇的主观感知则相对边缘化，女性对自己身体的认识和控制能力被削弱。

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出发，女性有权获得关于生育过程的全面、准确的信息，并且基于完整信息和自由意志做出生育决策，这也被写入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其中的第16条明确指出，要保障妇女“自由负责地决定子女人数和生育间隔，并有机会获得使她们能够行使这种权利的知识、教育和方法”^②。然而，主流媒体网站关于生育的新闻选择实则意味着，女性的知情权、身体自主权、健康权等并没有得到充分实现，根深蒂固的性别文化压抑了女性作为生育主体的自觉意识，并且表现为生育自由与传统思想、国家政策之间的博弈^③。其结果是，如果没有社交媒体或私人间的分享，女性实则是在对生育代价知之甚少的情形下，近乎盲目地成为母亲的。

在“幸福母亲”的意识形态下，生育的代价和挑战往往被隐藏和常态化，而一旦女性成为母亲，“所有人都是这样过来”的思维方式，又忽视了母亲个体的生命体验和正当权益。与此同时，医学话语在承诺美好愿景的同时，将症状的常见性和可预防性作为理由，强调母亲应当对自己的行为和胎儿的健康负责。其中的悖论便在于，当社会强调提振生育率时，女性显然肩负着某种神圣的社会责任，但是在具体的困境中，她们的体验很少能够言说，而且这些代价全然由她们自己承担。由此可见，当下的中国距离真正的“生育友好型社会”仍然任重道远。

二、科学母职与哺乳化的身体

在经历分娩之后，女性面对的另一挑战则是哺乳。随着国际母乳喂养倡导运动的发展，提高母乳喂养率似乎成为了社会共识。然而，这样的倡导往往缺乏对于女性主体性的关注，在人口健康这一公共利益面前，女性的权益难以得到正视和维护^④。

政治学者考特妮·琼格指出，由于母乳喂养的对照实验设计难度很大、且在道德伦理层面备受诟病，因此，关于母乳益处的科学研究大多依靠的是观察，而既有研究显示，母乳喂养在降低儿童感染风险方面具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在降低其他病症发生率或者提升婴儿智力方面缺乏有效证据，部分研究结果甚至互相矛盾^⑤。因而，“母乳最优”与其说是一项科学结论，倒不如说是对科研结果进行选择性地呈现的人为运作，其背后有着复杂的意识形态，

① 林晓珊：《母职的想象：城市女性的产前检查、身体经验与主体性》，《社会》，2011年第5期，第133-157页。

② 联合国：《性健康和生殖健康和权利》，<https://www.ohchr.org/zh/women/sexual-and-reproductive-health-and-rights>

③ 邓静秋：《“三孩”政策背景下的女性权利：从“母亲受国家保护”的宪法内涵展开》，《人权》，2022年第2期，第118-138页。

④ 杜鹃：《“母乳最优”哺育伦理与整体性母职的建构》，《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第54-64页。

⑤ [加]考特妮·琼格著：《母乳主义：母乳喂养的兴起和被忽视的女性选择》，张英杰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83-84页，101页。

包括宗教信仰、环保主义、对于公共医疗支出的考量以及母乳喂养产业的发展等^①。其结果是，母乳喂养被赋予了崇高的道德地位，母乳也从配方奶粉的替代性选择变成了符合育儿伦理的“唯一”选择。

虽然女性主义者最初希望借由母乳喂养来促进女性身体的解放、提高母亲的地位，然而，后续的发展却并不乐观。科学主义的话语强化了非母乳喂养、喂养不当等的潜在风险，并强化了母亲对婴儿健康所负有的道德责任，这巩固了密集母职的意识形态，进而加剧了母职压迫^②。具体而言，母乳喂养规定了女性应当如何使用和塑造自己的身体，比如饮食、穿着等，而这又进一步被泛化为：母亲与婴儿之间天然有着比父亲更紧密的联系，因而在育儿中有着特殊的性别优势，育儿劳动中的性别分工也就进一步被合理化。那么，在中国，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在“人民网”使用哺乳、母乳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并进行合并、去重，删除“哺乳动物”相关内容后，共得到 635 条数据。对其进行中文分词可得，TF-IDF 值居于前列的词语包括：母乳喂养、女职工、中国、营养、哺乳期等。

词语	TF-IDF	出现次数
母乳喂养	0.010065276	586
母乳	0.009121348	885
宝宝	0.007332105	399
女职工	0.006162864	207
婴儿	0.005553034	319
妈妈	0.005471133	291
母婴	0.005230209	214
哺乳	0.005039735	699
哺乳期	0.004051611	155
中国	0.004014716	122
营养	0.003726734	150

图 3-2 哺乳/母乳相关文本中 TF-IDF 值排名前十一位的词汇

对相关文本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母乳喂养问题集中体现了女性面临的结构性困境。第一，对于母乳价值的认知在中国同样根深蒂固，这一认知经由科学、商业和道德话语在社会中广泛传播。例如，母乳宣传活动常常将喂养行为与“爱”联系在一起，强调“母子交流是婴儿心理发展的首要条件”“新手妈妈过早放弃哺乳是一种误区”。中国营养学会、中国母乳科学大会、中疾控、科普中国等权威机构以及相关的报告、研讨会，反复强调母乳是儿童的最佳营养来源。部分与奶粉相关的商业性新闻，也宣称产品的营养成分“接近母乳”，

① [加]考特妮·琼格著：《母乳主义：母乳喂养的兴起和被忽视的女性选择》，张英杰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22 年版，第 10-11 页。

② 杜鹃：《“母乳最优”哺育伦理与整体性母职的建构》，《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20 年第 4 期，第 54-64 页。

以此获得消费者的信任与市场优势。然而，对于母乳的过分强调实则是在暗示：那些无法进行母乳喂养的母亲不够爱自己的孩子，这会进一步触发母亲的羞耻感。

第二，婴儿喂养不只是家庭内部的个人选择，而是被视为“国事”。这一方面体现为国家对于女性“哺乳自由”和相应基础设施的重视，比如母乳库、母婴室的建设等；另一方面，作为优生优育理念的延续，母乳喂养也被视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举措。

第三，媒体中关于母乳的话语，在不断教导母亲如何塑造身体，从而满足婴儿的需求，例如哺乳期的饮食禁忌、药物禁忌，患感冒和乳腺炎期间能否哺乳，哺乳期能否使用手机等，但是却往往忽视了母亲的需求和感受。偶有文章提及哺乳的疼痛和疲惫，也只是作为文章背景一笔带过，其主题仍是“如何正确进行母乳喂养”。然而，乳汁分泌不足、乳腺炎、涨乳、忌口、背奶、愧疚、自责都给新手妈妈带来了极大的精神压力和身体疼痛^①。这种重视婴儿、忽视母亲的行为，寄托了传统的“神圣母职”的期待，即：母爱是神圣的，母亲应当为孩子付出所有必要、可能的努力。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女性的身体和生育能力被视为家庭和社区的公共财产，其身体逐渐异化为“以哺乳为中心”的身体^②，这是身体自主权的丧失。

第四，从新闻文本来看，为了解决女职工的哺乳难题，地方政府向用人单位提出了一系列的法律要求。以郑州的新政为例，该政策要求用人单位在孩子周岁之前，每天给予女职工不少于2小时的哺乳时间^③。这是社会进步的体现，然而，在经济理性主导的就业市场中，要求企业保障女员工的特殊权益，实则意味着用人成本和管理复杂性的增加，这会加剧职场的性别歧视。而作为母职的组成部分，对于母乳喂养和哺乳假的强调，同样会加剧女性的困境。关于孕产妇就业的研究表明，母乳喂养减少了妇女对于劳动力市场的参与^④。

本文无意于否认母乳喂养的合理性，如前文所述，问题在于，母乳喂养的积极作用被人为放大，并形成了某种束缚女性的社会规范，而这种行为规范强化了性别分工，并且加剧了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劣势地位。学者 Joan B. Wolf 认为，“警告母亲不进行母乳喂养会给婴儿带来健康风险，就好比告诉她们不进行家庭聚餐会给孩子的学业成功带来风险一样”，这是将间接的指标当作了真正的原因^⑤。此外，母乳喂养的宣传中广泛引用的是“母婴关系”（maternal bonding）理论，这一研究以幼年灵长类动物和战争孤儿为研究对象，主要强调：婴儿与母亲在生命早期的身体接近会影响母婴之间的心理连贯性，该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被科学界广泛驳斥，更多的证据表明，母乳喂养在母婴结合中的作用，实则是一

①② 许怡、刘亚：《母职初体验：基于自我民族志与网络民族志的城市女性哺乳实践研究》，《山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8期，第95-106页。

③ 人民网：《郑州出台婴幼儿照护新政：孩子周岁前女职工每天哺乳时间不少于2小时》，2022年2月20日，<http://henan.people.com.cn/n2/2022/0220/c351638-35141593.html>

④ Lindberg, Laura Duberstein. "Women's decisions about breastfeeding and maternal employment."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1996): 239-251.

⑤ Wolf JB. Is breast really best? Risk and total motherhood in the National Breastfeeding Awareness Campaign. *J Health Polit Policy Law* 32.4(2007):595-636.

种被建构的神话^①。换言之，配方奶粉并不意味着分离、无营养、冷漠，母乳也并非“液体黄金”，它并不意味着亲子的结合和更多的爱意，母亲并不比父亲更适合承担婴儿的照料责任。如果在孩子身上花费同样的时间、精力，父亲也可以是合适的照料者。

由此可见，科学母职以及与之相伴的密集母职、神圣母职是值得怀疑的，当然，这并不是指科学本身是无用的，而是试图提示：科研是拥有主观意识的人的行为，其中，科学研究的方法是否经得起推敲，学界是否真正达成了一致的意见，最终是哪一方的观点被采纳、传播，这些行为的背后都有特定的意识形态在发挥作用。而在女性主义的视域下，当这一系列结果导向的是由单一性别承担的抚育责任时，其背后的科学主张便更值得深究。

第三节 生育政策与社会分工的性别隔离

一、生育政策需导向良性的生产关系

在传统社会，家庭是生产和消费的基本单位，养育孩子不仅可以“防老”，而且能够帮助家庭完成耕种、养殖、织布、徭役等劳务，甚至可以凭借武力保护家庭成员的生命财产安全。换言之，生育孩子，尤其是男丁，实则是提升家庭内部生产力的有效手段。此外，在物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养育孩子的成本相对较低，儿童能否躲避瘟疫、战争、饥荒存活下来，实则是一种概率事件。与之相适应的是，生育制度长期以父母为核心，养育也被视为家庭或家族内部的责任。

相较之下，在现代社会，随着工业化和社会化生产的发展，劳动力不再局限于家庭内部的生产活动，而是转变为一种社会资源，与此同时，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也逐渐社会化，政策调节和观念变化成为影响人口规模的关键因素。当前，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凸显，为了调节人口结构、培育新生代劳动力，继 80 年代以后，生育及养育再次从私人领域走向了公共领域，提高人口出生率迫在眉睫。然而，基于生活方式、生存压力、养育成本等的考量，以及计划生育和现代教育推动的观念转变，个体的生育意愿却急剧下降。

这就形成了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分歧，而利益分歧的背后则是一种结构性的困境。一方面，生育、养育和教育儿童的收益已经从家庭辐射到了整个社会，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也使得抚养子女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成本陡增。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的现代化和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水平有限，儿童的养育成本主要由家庭承担，各级政策的支持力度和普惠性有限，而在家庭内部，相较于男性，女性又承担了更多的养育责任。在女性性别意识觉醒且广泛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当下，这种模式显然难以为继。

由此可见，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生育政策的调整不能只是对老龄化危机的被动应对，而要在新型生产力的条件下，通过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推动生产关系的转变，从

^① Law, Jules. "The politics of breastfeeding: Assessing risk, dividing labor."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25.2 (2000): 407-450.

而使得劳动组织方式和分配方式利于人口的再生产，使得承担社会再生产的人群，尤其是女性，获得公正的对待。

劳动力的社会再生产包括劳动力的维持、再生和培养，换言之，就是一系列的照护、生殖、养育、教育工作。过去，再生产劳动被视为与生产劳动相矛盾的存在，因而在性别分工中承担再生产劳动的女性就“天然”成为市场中劣等的生产者，然而生产和再生产原本是一体的^①。在狩猎采集的原始社会，生产和再生产都以生存和族群延续为目的，其冲突并不明显；而在后续的农业社会，虽有性别角色的差异，但是生产和再生产是在同一空间内进行的。由此可见，公私领域的分离和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化实则是工业社会的产物。因而，对于生育政策的优化应当破除不合理的性别差异和分工，将生产和再生产统合为单一过程^②，使得男性和女性同时成为生产者和再生产者。而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看，这关系到如何定义和培养劳动力，如何进行劳动分工，如何进行收入分配和社会资源的再分配。具体而言，就是如何分配社会与家庭、男性和女性在儿童生育、抚养、教育、社会化过程中应负的责任，以及是否真正将女性广泛纳入劳动力市场和多元的行业？

有学者对瑞典、德国、英国、西班牙四国的生育政策进行比较，指出，生育支持政策是否有效，关键在于它能否导向“去家庭化”，并且促进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平等^③。而当下中国的“三孩政策”成效并不明显，部分原因也就在于“去家庭化”和性别平等的进程缓慢。

二、性别化的政策加剧性别隔离

2021年5月31日，“三孩”生育政策正式实施，而智联招聘历年发布的《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则描绘了生育政策的另一重面向。2021年，55.8%的女性在求职中被问及婚育，而在“三孩政策”实施后的第二年，也就是2022年，61.2%的女性在求职中被问及婚育^④。虽然2023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护法》在第四十三条中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在聘用职工时，除个人基本信息外，不得进一步询问或者调查女性求职者的婚育情况^⑤，但是2023年的调查显示，仍有61.1%的女性在求职中被问及婚育，且远高于男性的21.5%^⑥。这表明，从结果来看，现行的以提振生育率为导向的措施使得女性的职场处境愈加不利，而从出生人口数据来看，低迷的生育意愿也并未扭转。

既有的新闻文本、地方政策表明我国正在完善生育相关的配套措施，比如“育儿假”“陪

① [日]上野千鹤子著：《父权制与资本主义》，邹韵、薛梅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69-71页。

② 参见[日]上野千鹤子著：《父权制与资本主义》，邹韵、薛梅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72页。

③ 房莉杰、陈慧玲：《平衡工作与家庭：家庭生育支持政策的国际比较》，《人口学刊》，2021年第2期，第86-97页。

④ 智联招聘：《2022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https://cdn.zhituquan.com/2022/05/1652661653-f4f33dd8ab944e4.pdf>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护法》，https://www.gov.cn/guoqing/2021-10/29/content_5647634.htm

⑥ 智联招聘：《2023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https://www.baogaoting.com/info/247273>

产假”^①“生育保险”^②等，这些都是可喜的变化。但是，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来看，生育、抚育、教育的家庭偏向和母亲偏向仍未改变，这就意味着，随着生育子女数量的增加，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责任被更多地转移到了女性个体身上。

截止到2023年8月6日，在与“生育”相关的新闻文本中，“女性”一词出现了840次，“男性”一词仅出现了115次。现有的政策固然在关心女性的生育健康与权利，但是，在“生育”相关的公共话语中，过于强调“女性”身份，实则也在暗示女性承担主要的生育责任，而男性则被边缘化，这是对于生理特征的扩大化。实际上，男性在备孕、生育决策、哺育、养育和教育方面，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男性拥有足够的带薪时间来照料儿童的正当权利，并没有得到劳动力市场、社会政策乃至社会文化的承认^③。

以人民网频繁报道、多加赞誉的“妈妈岗”为例，这是面向有抚养责任的女性开发的弹性工作岗位，是在社会发展水平有限的前提下进行的渐进性改革，有其发展性的面向。但是，就其命名方式和目标群体来看，这一举措的前提仍然是女性在育儿中承担更多的责任。而且，在现行的工作伦理下，“妈妈岗”的弹性特征使其往往局限于低端服务业、制造业，就效果来看，这也会引导妈妈们在职场中从事基础性、重复性的劳动，以便在日托机构等社会服务缺位时，能够兼顾家庭内部的无酬照护。由此可见，“妈妈岗”与“全职妈妈”在性别分工上具有内在逻辑的一致性，并没有真正改变女性的职场困境。

由此可见，在当下，性别的不平等往往不会表现为显性的性别歧视，而是体现为一种不言自明、顺理成章的预判，比如女性、母亲的特性、偏好、职责等，并且基于这种预设提供适配的选择。研究发现，强调女性的利他属性和关怀倾向、认为女性对家庭和子女负有更大责任的假设，限制了女性的流动性、独立性和生产力^④。而如果一味增加对于母亲身份的制度化支持，长远来看，可能会损害女性的正当权益^⑤。

第四章 结语

第一节 主流媒体网站建构的四重母职

虽然大量的文学作品、新闻报道都在歌颂母性，声称母亲是天然的养育者、照护者，但是作为成规和习俗的母职，其实质是父权制下的一种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⑥，而女性的育

① 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http://www.bjrd.gov.cn/rdzt/dfxfgdxb/202201/P020220119337698715026.pdf>，2021年11月。

② 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关于做好支持三孩政策生育保险工作的通知》，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07/26/content_5627470.htm，2021年7月6日。

③ 王向贤：《转型时期的父亲责任、权利与研究路径——国内父职社会学研究述评》，《青年研究》，2019年第1期，第84-93+96页。

④ Badgett, M. V. "Assigning care: Gender norms and economic outcomes." *Int'l Lab. Rev.* 138 (1999): 311.

⑤ Russo, Nancy Felipe. "Overview: Sex roles, fertility and the motherhood mandate."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4.1 (1979): 7-15.

⑥ [美]艾德丽安·里奇著：《女人所生：作为体验与成规的母性》，毛路、毛喻原译，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第

儿责任也受到所谓“正确”劳动分工的影响。近代工业社会通过对“生产”和“再生产”劳动的人为分割和对后者的排斥、贬抑，使女性成为了与“理想工人”相对的劣质劳动力，而固化的劳动分工、不利的经济地位又使得性别平等往往成为一种“政治正确”的话语，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女性仍然处于劣势地位。

具体到中国，自 90 年代经济体制改革以来，随着公共托幼系统的瓦解和公共教育的转型，那些成为母亲的女性承担着包括孕育、哺乳、生活照料、课业管理等在内的密集母职，并且在劳动力市场中承受着“性别-母职的双重税赋”^①，职业发展屡遭瓶颈。虽然主流价值观念倡导性别平等，但是，通过分析“人民网”平台与母亲、生育等相关的文本，可以发现，媒体建构了作为文化意象的“自然母职”和“社会母职”，以及作为生育主体的“神圣母职”和“科学母职”。

首先，媒体大量沿用传统文化中的“母亲河”叙事，而“母亲河”作为一种隐喻，实则内化了传统的性别规范，暗示女性应该以一种自然而然且无条件的方式奉献自我、养育后代。与此同时，媒体中还存在着“自然母职”和“文化父职”的区隔。与河流一般的“母亲”不同，在典型报道中，父亲往往被塑造为民族英雄和文化引领者。这种二元对立的身份建构复刻了古老的性别角色。其次，从新闻报道来看，在社会服务和公益活动中，无论女性的婚育状况如何，她们都会被视作天生的照顾者和关怀者，因而被期望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而借助“爱心妈妈”“环保妈妈”等称呼，女性公民精神的生长被转译为性别分工的强化。与此同时，社区参与中存在着严重的性别失衡现象，通过将“照护者”的角色分配给女性，相关机构间接地塑造和维持了母性的标准，并且在公共领域中延续了女性在家庭中的分工，这意味着，社会再生产以及公共服务的部分成本都通过无酬劳动的形式转嫁给了女性，而无酬劳动在两性中的分配不均正是性别不平等的根源。

再次，从生育母职的建构来看，近代民族国家的诞生使得大规模的人口调控具有了合理性，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视域下，生命政治应当以尊重个体的权利和选择为前提，就此而言，不生育的自由是女性生育权的应有之义。但是，科学、政策、传统和媒体话语协同生产的人口知识具有明显的倾向性，宣传了服务于国家运行的单一生育观念，并且延续了“女性做母亲是自然的”“母亲角色带来幸福”“母亲是孩子的最佳照顾者”等迷思。此外，在关于分娩疼痛及其并发症的报道中，科学话语取代女性的主体经验占据主导地位，女性的知情权、身体自主权、健康权等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实现，而对于生育代价的隐藏又巩固了“幸福母亲”的意识形态。在哺乳阶段，母乳喂养被高度道德化，科学话语、媒体话语不断教导母亲如何塑造自己的身体以满足婴儿的需求，但是，母亲的个体感受完全遭到忽视，她们的身体和生育能力被视为家庭和公共财产。

4 页.

① 杨菊华、孙超：《论劳动力市场的“性别-母职双重税赋”》，《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9 年第 1 期，第 93-103 页。

最后,以打造生育友好型社会为目标的政策调整,虽然出于美好的愿望、并且借鉴了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但是因为缺乏对妇女真实生命处境的理解,也受限于社会生产力的水平和性别观念的水位,就其结果来看,存在加剧性别隔离、强化母亲使命的倾向。

综上所述,以人民网为代表的主流媒体网站进行了自然母职、社会母职和生育母职的建构,并且部分地延续了关于传统母亲角色的迷思。虽然社会普遍认同性别平等的主张,但是,主流媒体网站的宣传报道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仍然存在性别刻板印象、性别分工不合理、忽视女性主体性和权益等问题。这种无意识的性别不平等植根于父权制社会与传统文化,由于性别解放的不彻底性延续至今,并且通过道德约束、生命政治和知识生产发挥作用。由于媒体、科学、道德与政策话语的高度统一,这种性别不平等常常被忽视。总体而言,中国社会的性别解放和母职转型仍然任重道远。在这种情况下,女性对生育的控制权,高度依赖于她所拥有的经验、资源以及对生育代价的认知,这也解释了为何生育率与女性的社会地位呈负相关。

第二节 女性困境的三重框架

基于费尔克拉夫话语分析的三重框架:文本、话语以及社会实践,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从文本来看,主流媒体网站在报道中采用传统文化意象,比如“母亲河”;颂扬被认定为主流价值观的理念,比如无私奉献、关爱他人等;使用互文性、隐喻、框架建构、承诺与要求、名词化等表达技巧,积极宣传提振生育率的政策,并且塑造了母亲在家庭、社区中的核心角色。这种报道策略不仅反映了社会对于“理想母亲”的期待,也与正面宣传的基调相符。然而,这些意象的取用、行为的歌颂和政策的实施,是高度性别化的,隐含对于性别角色和性别分工的固有偏见,例如将女性定位为“天然的照料者”和“无酬劳动的主要承担者”。

从话语生产、传播的角度考量,媒体文本的创作,实则受限于其成员所拥有和能够利用的话语资源,包括语言、符号、习俗等,这些资源又植根于社会结构与规范当中^①。而以“人民网”为代表的主流媒体网站,素来以传统美德和大政方针为衡量标准,以正面宣传为导向,因而其报道会受到政治和文化编织的社会结构的深刻影响。可以说,主流媒体网站实则通过文化和人口知识的生产在建构传统母职,以服务于当前的生命政治和社会秩序。

从社会实践来看,既有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母职预设,流淌着父权制的基因,又被高度道德化、合理化,成为一种“常识”和“集体无意识”,母亲的“家庭化”“弱势化”“符号化”“公共角色缺失”^②等特征深入人心。而在当代,这些文化基因又渗透在公共参与、家庭生活、市场经济中,以性别分工的形式具象体现,再生产了女性的弱势地位。而性别分工的调整和性别观念的纠偏又牵涉两性之间、公私之间权、责、利的重新分配。在生产水平有限、财政支持不足、利益格局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全社会几乎默认大量的再生产劳动仍然由女

① [英]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殷晓蓉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74页。

② 俞明雅:《教科书中的母职叙事——以X版小学语文教科书为中心的考察》,《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0年第4期,第58-64页。

性无偿承担。

令人忧虑的是，在后疫情时代经济下行的背景下，由于市场中的就业机会减少，女性正面临更激烈的竞争压力和更严重的职场歧视，更易被“推出”职场。与此同时，风险社会中传统观念的强化、传统家庭模式的回归，加之国家对于生育率和人口数量的强调，又将女性“拉回”家庭。这一“推”一“拉”，极易使得妇女解放的进程发生历史性的倒退。社会的转向是缓慢、复杂的，妇女的解放必须基于对其处境和利害关系的正确理解，必须基于那些由妇女发出合法声音的政策和行动^①，否则，善意的政策和美好的愿景并不一定导向良善的社会。

话语分析受限于研究方法的批判性，难免会受到先判断后求证的质疑，本文无意于否认社会发展的积极面向，也无意于将性别解放的不充分完全归咎于媒体。如前所述，通过对社会现象和政策方针的宣传报道，媒体参与了社会观念的塑造，同时也深受社会结构的束缚。可以说，性别偏见并非只是媒体话语的产物，而是植根于所有人的内心。因而，关于母职建构的探究，究其根源，是对性别分工和性别平等的追问。这不仅仅是传播和观念的问题。在更深层次上，这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生产关系的协调和人类对未来图景的设计。

当前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然由刘易斯型增长转向索洛型增长，即经济增长的动力从依赖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转向依托技术创新、效率提升和产业升级^②。因而，当前的发展应当校正重“数”轻“质”的发展倾向，重视人的能动作用^③，换言之，人口政策的设计理念要由重视人口数量带来的红利，转向培养高素质的劳动力。而从整个社会来看，实现生产与再生产的整合、破除市场与家庭的二元对立迫在眉睫。一方面，要严格贯彻劳动法，推动 996 式的“贪婪工作”向更具有灵活性的工作转变，破除企业对于“理想工人”的不合理期待，实现两性在家庭和事业方面的平衡^④；另一方面，应当推动社会力量和家庭成员参与育儿的全过程，打破“理想母亲”的迷思，探寻全新的社会保障制度。此外，从全球来看，生育率下降是现代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趋势，国家还亟需探索“刺激生育”之外的经济增长和社会保障措施。

第三节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文就“主流媒体网站的母职建构”这一议题展开讨论，虽然得出了基本观点，并进行

① A. Leung et al. "Feminism in Transition: Chinese Culture, Ideolog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omen's Movement in China."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 (2003): 359-374.

② 郭剑雄：《人口量质转型与中国经济增长——从马尔萨斯陷阱到内生型增长的人口变迁视角审视》，《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6 期，第 22-33 页。

③ 罗淳、王丛雷：《马尔萨斯的忧虑与当代国人的困惑——关于人口价值观的历史回望与现实重塑》，《人口与经济》，2019 年第 6 期，第 57-69 页。

④ 李珊珊、李璐：《我们专访了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996 式贪婪工作加剧男女不平》，https://mp.weixin.qq.com/s/SdPZsDHZJ4_FmAdYfe89rA，2023 年 10 月 10 日。

了理论和实践的反思，但是仍有不完善之处，有待后续研究加以补充、验证。

首先，受限于研究样本的年份范围（2020-2023 年），本文未能对主流媒体网站的母职建构做出历时性的考察，未能反映其中的变化趋势，比如主流媒体网站的性别意识是否有所进步，近年来是否有观念和措辞的调整，其推动因素是什么？其次，本文虽然使用了费尔克拉夫的三重框架理论，但是研究方法局限于文本挖掘和分析，未能引入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法等，无法对新闻文本的生产、消费过程做出更深入的分析、考察。再次，借助机器学习的共词分析、词频分析等，会使得文本语境丢失，虽然个案分析能够部分弥补微观视角，但是它局限于单篇文章，无法探究篇章之间的互动关系。最后，由于工具的运用能力有限，本文对于文本挖掘方法的使用，仍停留在词频分析、共词分析、情感分析等初始阶段，可能会忽视有价值的研究结果；受限于检索词和研究样本的选取，本文的研究结果也依赖不同类型和体量的新闻文本的验证。

参考文献

网络资料

- 国家统计局:《2023 年国民经济回升向好 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 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401/t20240117_1946624.html, 2023 年 1 月 17 日.
- 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http://www.stats.gov.cn/sj/zxfb/202302/t20230228_1919011.html, 2023 年 2 月 28 日.
- 央视网:《国家卫健委:2035 年左右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破 4 亿 占比将超 30%》, <https://news.cctv.com/2022/09/20/ARTInjejqDvmMaZi5jzTPHYT220920.shtml>, 2022 年 9 月 20 日.
- 新华社:《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 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决定》, https://www.gov.cn/xinwen/2016-01/05/content_5030806.htm, 2016 年 1 月 5 日.
- 新华社:《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 https://www.gov.cn/zhengce/2021-07/20/content_5626190.htm, 2021 年 7 月 20 日.
- 求是网:《习近平:保障妇女权益必须上升为国家意志》, http://www.qstheory.cn/laigao/ycjx/2022-06/22/c_1128765281.htm, 2022 年 6 月 22 日.
- 刘中一:《新中国 70 年 | 我国托育发展的七十年》, https://www.cpdrc.org.cn/ztlj/70/201910/t20191009_2924.html, 2019 年 10 月 9 日.
-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编 婚姻家庭, https://www.spp.gov.cn/spp/ssmfdyflvdtgpgz/202008/t20200831_478417.shtml, 2020 年 8 月 31 日.
- 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http://www.bjrd.gov.cn/rdzl/dfxfgdxb/202201/P020220119337698715026.pdf>, 2021 年 11 月.
- 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关于做好支持三孩政策生育保险工作的通知》,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07/26/content_5627470.htm, 2021 年 7 月 6 日.
- 人民网: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 尊重个体生育意愿, 转载自《中国青年报》, 2021 年 2 月 3 日, <http://yn.people.com.cn/n2/2021/0203/c372441-34561918.html>
- 人民网:“东方女化学家”程春生:筑牢精细化工安全屏障, <http://edu.people.com.cn/n1/2021/1204/c1006-32299501.html>, 2021 年 12 月 4 日.
- 人民网:四川省人大代表钟小红:拓宽已婚育龄女性生育意愿意见征集渠道, 2022 年 1 月 21 日, <http://sc.people.com.cn/n2/2022/0121/c379469-35106596.html>
- 人民网:多措并举推进生育力保护 这个“避孕日”聊聊“生”, 2022 年 9 月 25 日, <http://sh.people.com.cn/n2/2022/0925/c134768-40138678.html>

人民网:《郑州出台婴幼儿照护新政:孩子周岁前女职工每天哺乳时间不少于 2 小时》,2022 年 2 月 20 日,<http://henan.people.com.cn/n2/2022/0220/c351638-35141593.html>

浦东卫生计生:为爱守护,孕育健康|浦东新区开展 2022 年世界避孕日主题宣传活动,2022 年 9 月 26 日,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20071416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护法》,https://www.gov.cn/guoqing/2021-10/29/content_5647634.htm

智联招聘:《2022 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https://cdn.zhituquan.com/2022/05/1652661653-f4f33dd8ab944e4.pdf>

智联招聘:《2023 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https://www.baogaoting.com/info/247273>

千瓜数据:《2022 年千瓜活跃用户画像趋势报告(小红书平台)》,2022 年 3 月 29 日,<https://www.qian-gua.com/blog/detail/1591.html>

林爱宝:生孩子究竟有多痛?正确认识分娩疼痛,2016 年 6 月 5 日,<https://obgyn.dxy.cn/article/495155>

澎湃新闻:七成女性仍受分娩之痛,无痛分娩普及到底难在哪儿?2023 年 10 月 1 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4892205

李珊珊、李璐:《我们专访了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996 式贪婪工作加剧男女不平等》,https://mp.weixin.qq.com/s/SdPZsDHZJ4_FmAdYfe89rA,2023 年 10 月 10 日.

澎湃思想市场:《疫论·性别 | 降薪失业、以性换租、照料惩罚 :疫情下的全球女性贫困》,2021 年 2 月 3 日,<https://mp.weixin.qq.com/s/xivM76tYoXY480QhBURajQ>

联合国:《性健康和生殖健康和权利》,<https://www.ohchr.org/zh/women/sexual-and-reproductive-health-and-rights>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Research: Women Leaders Took on Even More Invisible Work During the Pandemic",
<https://hbr.org/2021/10/research-women-took-on-even-more-invisible-work-during-the-pandemic>, 2021.10.13.

Anna Louie Sussman: "How to Value Unpaid Care Work: The \$10 Trillion Question",
<https://www.newsecuritybeat.org/2018/10/unpaid-care-work-10-trillion-question/>,2018.10.11.

World Economic Forum: "Global Gender Gap Report 2022",<https://cn.weforum.org/reports/global-gender-gap-report-2023>,2023.6.20.

中文论文

王慧、叶文振:《中国生育观念的变迁与启示》,《福建江夏学院学报》,2023 年第 3 期,第 68-74 页.

林晓珊:《母职的想象:城市女性的产前检查、身体经验与主体性》,《社会》,2011 年第 5 期,

第 133-157 页.

邓静秋:《“三孩”政策背景下的女性权利:从“母亲受国家保护”的宪法内涵展开》,《人权》,2022 年第 2 期,第 118-138 页.

石智雷、杨雨萱:《女性权益、社会地位与生育选择:相关文献评述》,《人口学刊》,2019 年第 1 期,第 31-44 页.

石智雷、郑州丽:《性别视角下生育意愿研究》,《财贸研究》,2023 年第 6 期,第 9-20 页.

蒙克:《“就业—生育”关系转变和双薪型家庭政策的兴起——从发达国家经验看我国“二孩”时代家庭政策》,《社会学研究》,2017 年第 5 期,第 218-241+246 页.

蒋莱:《职业女性的生育二孩意愿——以上海市 HP 区楼宇就职女性为对象》,《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6 年第 5 期,第 49-56 页.

房莉杰、陈慧玲:《平衡工作与家庭:家庭生育支持政策的国际比较》,《人口学刊》,2021 年第 2 期,第 86-97 页.

宋少鹏:《民族国家观念的建构与女性个体国民身份确立之间的关系》,《妇女研究论丛》,2005 年第 6 期,第 50-56 页.

宋少鹏:《赋予五四运动以社会性别:女学生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6 期,第 60-66+158 页.

宋少鹏:《从彰显到消失:集体主义时期的家庭劳动(1949-1966)》,《江苏社会科学》,2012 年第 1 期,第 116-125 页.

宋少鹏:《清末民初“女性”观念的建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 年第 5 期,第 102-116 页.

宋少鹏:《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妇女——为什么中国需要重建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批判》,《开放时代》,2012 年第 12 期,第 98-112 页.

宋少鹏、高夏薇:《境况性知识、内在历史的视域:回看中国百年妇女运动的历史与经验》,《开放时代》,2022 年第 6 期,第 32-53+5-6 页.

张文灿:《妇女性别解放与阶级、社会解放的互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妇女解放运动的政策及效果》,《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6 期,第 105-108 页.

刘志玲:《从政治解放到自我解放——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历程的研究》,《前沿》,2007 年第 1 期,第 234-237 页.

刘利群:《可见与不可见——社会性别视角下的中国媒介与女性》,《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3 年第 2 期,第 35-38 页.

周绍雪:《女性主义运动:历史与理论的演进逻辑》,《湖南社会科学》,2009 年第 6 期,第 191-196 页.

王恩铭:《美国历史上的三次女权主义浪潮》,《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 年 3 月 11 日第 712

期.

赵赟:《西方女性主义的诞生背景与三次浪潮》,《哈尔滨学院学报》,2023年第3期,第35-39页.

陈阳:《性别与传播》,《国际新闻界》,2001年第1期,第59-64页.

张敬婕:《性别与传播研究30年发展轨迹》,《妇女研究论丛》,2009年第6期,第81-86页.

卜卫:《中国大陆媒介与性别/妇女研究回顾与分析(1995-2005)》,《新闻与传播研究》,2006年第4期,第78-89+96页.

卜卫:《女性主义媒介研究:‘理论旅行’与地方知识生产》,《新闻与传播研究》,2021年第9期,第55-74+127页.

李敏:《女性主义视域中的媒介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年第2期,第56-63+96页.

倪炎元:《再现的政治:解读媒介对他者负面建构的策略》,《新闻学研究》,1999年第58期,第85-111页.

曹晋:《批判的视野: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Media and Gender Studies)评述》,《新闻大学》,2005年第4期,第3-12页.

都岚岚:《后回潮时代的美国女性主义第三次浪潮》,清华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

吴小英:《母职的悖论:从女性主义批判到中国式母职策略》,《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21年第2期,第30-40页.

吕美颐:《评中国近代关于贤妻良母主义的论争》,《天津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第73-79页.

王向贤:《承前启后:1929-1933年间劳动法对现代母职和父职的建构》,《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6期,第165-188+245页.

金一虹:《社会转型中的中国工作母亲》,《学海》,2013年第2期,第56-63页.

施芸卿:《当妈为何越来越难——社会变迁视角下的“母亲”》,《文化纵横》,2018年第5期,第102-109页.

高碧叶:《中国女性孕育过程中的母职与母性赋权实践》,《广东社会科学》,2021年第3期,第198-209页.

许怡,刘亚:《母职初体验:基于自我民族志与网络民族志的城市女性哺乳实践研究》,《山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8期,第95-106页.

申超:《扩大的不平等:母职惩罚的演变(1989—2015)》,《社会》,2020年第6期,第186-218页.

杨菊华:《“性别—母职双重赋税”与劳动力市场参与的性别差异》,《人口研究》,2019年第1期,第36-51页.

杨菊华,孙超:《论劳动力市场的“性别-母职双重税赋”》,《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第93-103页.

- 王珀:《性别平等与母职惩罚》,《生命哲学研究》,2022年第1期,第149-159页.
- 吕山、李熠、林颖:《远距离“做家庭”:留守儿童家庭的媒介驯化与亲职实践》,《新闻与写作》,2022年第11期,第92-106页.
- 陈莹骄:《婆代母职:女性农民工的抚育职责及生命历程重置》,《求索》,2023年第3期,第179-187页.
- 姚岩:《学龄儿童母职角色再制的社会学思考》,《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8年第2期,第37-42页.
- 金一虹、杨笛:《教育“拼妈”：“家长主义”的盛行与母职再造》,《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第61-67页.
- 王蕾:《母职策略:城市中产女性孕产期的母职实践》,《社会建设》,2022年第3期,第64-78页.
- 裴谕新、龚泽玉:《“鸡娃不如鸡自己”:粤港澳大湾区创业女性的母职再造》,《妇女研究论丛》,2022年第05期,第70-82页.
- 肖索未、汤超萍:《流动的母职:乡城迁移中的母职协商》,《妇女研究论丛》,1981年第2期,第66-83页.
- 田竞开:《抗战时期《新华日报》的妇女报道分析》,《青年记者》,2018年第27期,第101-102页.
- 吕美颐:《评中国近代关于贤妻良母主义的论争》,《天津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第73-79页.
- 陶艳兰:《塑造理想母亲:变迁社会中育儿知识的建构》,《妇女研究论丛》,2016年第5期,第25-37页.
- 张竞丹:《孕育类App中的母职再现》,《新媒体研究》,2021年第24期,第22-24+30页.
- 陈蒙、陈倩:《大众媒介中的科学育儿话语和母亲角色再现——基于<为了孩子>杂志(2000-2018年)的文本挖掘》,《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第61-70页.
- 郑春风、郑生竹:《父职的媒介再现、社会再生产与现代中国家庭的结构转型——以<爸爸去哪儿>为例》,《新闻界》,2019年第9期,第70-81页.
- 沈奕斐:《辣妈:个体化进程中母职与女权》,《南京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第69-77页.
- 李梦竹:《社交媒体赋权:微信育儿群对母职自主性的建构》,《当代青年研究》,2022年第3期,第68-74页.
- 王欢:《仪式视角下母婴短视频的主体呈现、观看逻辑和生育文化困境》,《东南传播》,2023年第1期,第1-5页.
- 吴璟薇、张雅迪:《数字实践中的“混合父职”建构:爸爸博主的在线自我呈现》,《妇女研究论丛》,2022年第2期,第70-84页.

- 俞明雅:《教科书中的母职叙事——以 X 版小学语文教科书为中心的考察》,《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0 年第 4 期,第 58-64 页.
- 罗汉、邹月华:《媒介、话语与性别:虐童报道中女性形象研究——以“携程亲子园虐童事件”为例》,《新闻爱好者》,2020 年第 10 期,第 89-91 页.
- 王开敏:《对现代传媒表现中母亲形象的思考》,《电视时代》,2010 年第 Z1 期,第 16-17 页.
- 张公让、鲍超、王晓玉等:《基于评论数据的文本语义挖掘与情感分析》,《情报科学》,2021 年第 5 期,第 53-61 页.
- 辛斌、高小丽:《批评话语分析:目标、方法与动态》,《外语与外语教学》,2013 年第 4 期,第 1-5+16 页.
- 刘峥:《新闻语篇 CDA 研究方法初探——纽约时报拉登之死案例研究》,清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年.
- 胡雯:《费尔克拉夫话语分析观述评》,《牡丹江大学学报》2009 年第 6 期,第 63-65+70 页.
- 谭舒、董天策:《媒介批评:疑问与思考》,《新闻记者》,2002 年第 2 期,第 24-26 页.
- 金莉:《生态女权主义》,《外国文学》,2004 年第 5 期,第 57-64 页.
- 李家奎、韦清琦:《女性与自然:从本质到建构的共同体》,《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7 年第 3 期,第 38-44 页.
- [美] 潘以红:《战争从来不只是男人的事业:解读新四军女兵回忆录》,载《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2014 年第 24 期,第 83-131 页.
- 廖益清:《社会性别的批评话语分析述评》,《外语教学》,2008 年第 5 期,第 23-27 页.
- 陈文:《城市居民社区参与中的性别失衡——基于武汉市百步亭社区的个案研究》,《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4 期,第 84-89 页.
- 张文华、宋婷、秦小峰:《城市社区微治理中多元主体协同的博弈困境与女性参与》,《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23 年第 5 期,第 83-89 页.
- 张静敏、陈业强:《性别化策略:对城市老年人社区参与性别差异的解读》,《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4 期,第 137-143 页.
- 李升、任伟榕、黄德远:《“家庭牵绊”还是“工作引拉”?——中国女性的社会参与及其影响因素研究》,《Social Sciences in China》,2020 年第 1 期,第 133-158 页.
- 刘建军、张兰:《社区社会资本的性别化积累》,《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5 期,第 24-32+236 页.
- 孙悦:《安徽:女性时间都去哪儿了?》,《四川省情》,2019 年第 7 期,第 39-40 页.
- 郭伟峰:《福柯与阿甘本生命政治理论的根本区别——基于“生命”概念的视角》,《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9 年第 1 期,第 136-143 页.
- 苗翠翠:《生命政治学研究的三个基本问题及其路径重构》,《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23 年第 6 期,第 16-28 页.

- 吴冠军:《生命政治:在福柯与阿甘本之间》,《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年第1期,第93-99页.
- 吴家丞、戴雪红:《生命政治论的女性主义解读——以权力的三重向度为视角》,《国外社会科学》,2022年第4期,第171-181+200-201页.
- 闫培宇:《为什么生命政治行不通——对生命政治的崛起、繁荣与困境的再思考》,《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第113-119+129页.
- 周长友:《生育政治——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权力与技术》,华中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20年.
- 张丽屏、王丰龙、刘云刚:《人口、治理与政治地理学:生命政治研究综述与展望》,《人文地理》,2019年第1期,第46-53+105页.
- 王浦劬:《政治学基础(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 于天宇、王帅帅:《资本逻辑批判与生命逻辑建构——乔尔·科威尔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生命政治意蕴》,《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12月7日,第1-12页.
- 田海平:《论生育伦理的中国难题与道德前景》,《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年第3期,第178-186页.
- 王慧:《福柯话语理论视域下的性别话语转向》,《文艺评论》,2015年第3期,第17-21页.
- 刘丽媛:《女性乳腺癌危险因素及风险评估模型的流行病学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16年.
- 徐雅莉、孙强、单广良、张瑾、廖海波、李世拥、姜军、邵志敏、蒋宏传、沈念春、石岳、尉承泽、张保宁、陈妍华、段学宁、李波:《中国女性乳腺癌发病相关危险因素:病例对照研究》,《协和医学杂志》,2011年第1期,第7-14页.
- 刘保华、万舰、余婉燕、朱彩霞、王琼、黎金钱、陈书恩:《乳腺癌危险因素调查分析》,《河南医学研究》,2017年第21期,第3844-3847页.
- 余一雯、李贺、曹巍、左婷婷、杨雷、王宁、陈万青:《不同生育史的女性乳腺癌患者临床特征及预后分析》,《中国肿瘤》,2021年第12期,第947-952页.
- 徐德林:《接合:作为实践的理论与方法》,《外国文学评论》,2013年第3期,第139-161页.
- 龙佳解:《论先秦儒家的祭祀思想》,《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第87-92页.
- 杜鹏:《“母乳最优”哺育伦理与整体性母职的建构》,《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第54-64页.
- 许怡、刘亚:《母职初体验:基于自我民族志与网络民族志的城市女性哺乳实践研究》,《山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8期,第95-106页.
- 王向贤:《转型时期的父亲责任、权利与研究路径——国内父职社会学研究述评》,《青年研究》,2019年第1期,第84-93+96页.

- 郭剑雄:《人口量质转型与中国经济增长——从马尔萨斯陷阱到内生型增长的人口变迁视角审视》,《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第22-33页.
- 罗淳、王丛雷:《马尔萨斯的忧虑与当代国人的困惑——关于人口价值观的历史回望与现实重塑》,《人口与经济》,2019年第6期,第57-69页.
- 房莉杰、陈慧玲:《平衡工作与家庭:家庭生育支持政策的国际比较》.《人口学刊》,2021年第2期,第86-97页.
- 王思嘉:《媒介话语与女性生育观建构研究(1980-2021)》,辽宁大学硕士论文,2023年.
- 胡颖蕾、刘英杰:《框架理论视角下主流媒体的三孩议题报道分析——以人民网、新华网为例》,《科技传播》,2023年第8期,第63-65页.
- 张雪:《基于微博的三孩生育政策网络议程设置研究》,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23年.
- 李奕纯、刘英杰:《保护动机理论视角下生育政策议题的舆论失焦与矫正》,《新媒体研究》,2022年第15期,第11-14+20页.
- 王之尧:《<中国妇女报>计划生育报道的话语变迁研究(1984-2021)》,河北大学硕士论文,2023年.

中文著作或译著

- [日]上野千鹤子著:《父权制与资本主义》,邹韵&薛梅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 [法]西蒙娜·德·波伏瓦著:《第二性(合卷本)》,郑克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
- [美]艾德丽安·里奇著:《女人所生:作为体验与成规的母性》,毛路、毛喻原译,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
- [英]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殷晓蓉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
- [加]考特妮·琼格著:《母乳主义:母乳喂养的兴起和被忽视的女性选择》,张英杰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
- [法]米歇尔·福柯著:《性经验史》,余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 [法]米歇尔·福柯著:《必须保卫社会——法兰西学院演讲系列 1976》,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 贺桂梅:《女性文学与性别政治的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 《新旧约全书》,中国基督教协会印发,1989年版,南京.

英文论文

- Pfau - Effinger, Birgit. "Gender cultures and the gender arrangement—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cross - national gender research." *Innovation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11.2 (1998): 147-166.
- Duncan, Simon, and Rosalind Edwards. "Lone mothers and paid work-Rational economic man

- or gendered moral rationalities?" *Feminist economics* 3.2 (1997): 29-61.
- Budds, Kirsty, Abigail Locke, and Vivien Burr. "'Risky business' constructing the 'choice' to 'delay' motherhood in the British press." *Feminist Media Studies* 13.1 (2013): 132-147.
- Budds, Kirsty, Abigail Locke, and Vivien Burr. "'For some people it isn't a choice, it's just how it happens': Accounts of 'delayed' motherhood among middle-class women in the UK." *Feminism & Psychology* 26.2 (2016): 170-187.
- Correll, Shelley J., Stephen Benard, and In Paik. "Getting a job: Is there a motherhood penal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2.5 (2007): 1297-1338.
- Thébaud, Sarah, and Catherine J. Taylor. "The specter of motherhood: Culture and the production of gendered career aspirations i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Gender & Society* 35.3 (2021): 395-421.
- David, Miriam E. "Motherhood and social policy-a matter of education?." *Critical Social Policy* 4.12 (1984): 28-43.
- Correll, Shelley J., Stephen Benard, and In Paik. "Getting a job: Is there a motherhood penal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2.5 (2007): 1297-1338.
- Killewald, Alexandra.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fatherhood premium: Marriage, coresidence, biology, and fathers' wag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8.1 (2013): 96-116.
- Becker, Gary S. "Human capital, effort, and the sexual division of labor."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3.1, Part 2 (1985): S33-S58.
- Juhn, Chinhui, and Kristin McCue. "Specialization then and now: Marriage, children, and the gender earnings gap across cohort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31.1 (2017): 183-204.
- Benard, Stephen, and Shelley J. Correll. "Normative discrimination and the motherhood penalty." *Gender & Society* 24.5 (2010): 616-646.
- Steffens, Melanie C., Sabine Preuß, and Carolin Scheifele. "Work-related impression formation: Reviewing parenthood penalties and investigating a 'fatherhood penalty' for single fathers." *Basic and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41.5 (2019): 287-304.
- Shea, Rebecca, Lia Bryant, and Sarah Wendt. "'Nappy bags instead of handbags': Young motherhood and self-identity." *Journal of Sociology* 52.4 (2016): 840-855.
- Salusky, Ida. "The meaning of motherhood: Adolescent childbearing and its significance for poor Dominican females of Haitian descent." *Journal of Adolescent Research* 28.5 (2013): 591-614.
- McQuillan, Julia, et al. "The importance of motherhood among women in the contemporary United States." *Gender & Society* 22.4 (2008): 477-496.

- Otomo, Rio. "Redrawing a map of motherhood." *Japan Forum* 29.2 (2017): 180-195.
- Simon, Jenni M. "Disciplining drunken mothers: media representations of women's use of alcohol." *The communication review* 17.1 (2014): 45-64.
- Tobin, Beth Fowkes. "The tender mother: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motherhood and the lady's magazine." *Women's Studies: 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18.2-3 (1990): 205-221.
- Garner, Ana C., and Karen Slattery. "Mobilizing mother: from good mother to patriotic mother in World War I."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14.1 (2012): 5-77.
- Apple, Rima D. "Constructing mothers: Scientific motherhood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8.2 (1995): 161-178.
- Lynch, Karen Danna. "Advertising motherhood: Image, ideology, and consumption." *Berkeley journal of sociology* 49 (2005): 32-57.
- Motro, Joanna, and Reeve Vanneman. "The 1990s shift in the media portrayal of working mothers." *Sociological Forum*.30. 4(2015):1017-1037.
- Kuperberg, Arielle, and Pamela Stone. "The media depiction of women who opt out." *Gender & society* 22.4 (2008): 497-517.
- Press, Andrea. "Gender and family in television's Golden Age and beyond."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625.1 (2009): 139-150.
- Lehto, Mari. "Bad is the new good: Negotiating bad motherhood in Finnish mommy blogs." *Feminist Media Studies* 20.5 (2020): 657-671.
- Lee, Yoon-Joo, and Huan Chen. "Empowerment or alienation: Chinese and Korean immigrant mothers' perception of mobile media in constructing their social role and facilitating parenting practices in the US." *Mobile Media & Communication* 6.3 (2018): 390-406.
- Chae, Jiyoung. "'Am I a better mother than you?' Media and 21st-century motherhood in the context of the social comparison theory." *Communication Research* 42.4 (2015): 503-525.
- Niner, Sara, Denise Cuthbert, and Yarina Ahmad. "Good mothers, bad mothers: motherhood, modernity and politics in representations of child abuse in Malaysia's English-language newspapers." *Feminist Media Studies* 14.6 (2014): 993-1011.
- Johnston, Deirdre D., and Debra H. Swanson. "Undermining mothers: A content analysis of the representation of mothers in magazines."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6.3 (2003): 243-265.
- Dillaway, Heather, and Elizabeth Paré. "Locating mothers: How cultural debates about stay-at-home versus working mothers define women and home."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29.4 (2008): 437-464.
- David, Miriam E. "Motherhood and social policy-a matter of education?." *Critical Social*

- Policy* 4.12 (1984): 28-43.
- Cowdery, Randi S., and Carmen Knudson - Martin. "The construction of motherhood: Tasks, relational connection, and gender equality." *Family relations* 54.3 (2005): 335-345.
- Hirway, Indira. "Unpaid work and the economy: linkage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Indian Journal of Labour Economics* 58.1 (2015): 1-21.
- Antonopoulos, Rania. "The unpaid care work-paid work connection." *Levy Economics Institute, Working Papers Series* (2008).
- Daniels, Arlene Kaplan. "Invisible work." *Social problems* 34.5 (1987): 403-415.
- Hirway, Indira. "Unpaid work and the economy: linkage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Indian Journal of Labour Economics* 58.1 (2015): 1-21.
- McDaniel, Susan A. "Toward a synthesis of feminist and demographic perspectives on fertility."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37.1 (1996): 83-104.
- Greenhalgh, Susan. "The Chinese biopolitical: Facing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Genetics and Society* 28.3 (2009): 205-222.
- Russo, Nancy Felipe. "Overview: Sex roles, fertility and the motherhood mandate."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4.1 (1979): 7-15.
- Pavard, Bibia. "The right to know? The politics of information about contraception in France (1950s-80s)." *Medical History* 63.2 (2019): 173-188.
- H. Verkooijen et al. "Multiparity and the risk of premenopausal breast cancer: different effects across ethnic groups in Singapore." *Breast Cancer Research and Treatment*, 113 (2009): 553-558.
- Weingart, Peter. "Scientific expertise and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paradoxes of science in politics." *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 26.3 (1999): 151-161.
- Leung, Janet TY. "Perceived parental sacrifice, filial piety and hopelessness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s: A cross-lagged panel study." *Journal of Adolescence* 81 (2020): 39-51.
- Held, Lisa, and Alexandra Rutherford. "Can't a mother sing the blues? Postpartum depress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otherhood in late 20th-century America." *History of psychology* 15.2 (2012): 107.
- McDaniel, Susan A. "Toward a synthesis of feminist and demographic perspectives on fertility."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37.1 (1996): 83-104.
- A. Leung et al. "Feminism in Transition: Chinese Culture, Ideolog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omen's Movement in China."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 (2003): 359-374.
- Badgett, M. V. "Assigning care: Gender norms and economic outcomes." *Int'l Lab. Rev.* 138 (1999): 311.

- Lindberg, Laura Duberstein. "Women's decisions about breastfeeding and maternal employment."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1996): 239-251.
- Wolf JB. Is breast really best? Risk and total motherhood in the National Breastfeeding Awareness Campaign. *J Health Polit Policy Law* 32.4(2007):595-636.
- Law, Jules. "The politics of breastfeeding: Assessing risk, dividing labor."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25.2 (2000): 407-450.

英文著作

- Hays, Sharon,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Motherhood*,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 Kourany, Janet A., James P. Sterba, and Rosemarie Tong, *Feminist philosophies: Problem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Upper Saddle River: Prentice Hall, 1992.
- Gupta, J. A. *New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 women's health and autonomy: Freedom or dependency*,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2000.
- Gillis, J. R. *A world of their own making: Myth, ritual and the quest for family valu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OAKLE A. *Woman's work: The housewife, past and present*,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6.

致 谢

三年前的9月，因为疫情的缘故，开学时间一直在推迟，到学校报到那天，需要等当日的核酸检测结果，漫长的、焦灼的午后。这样的等待，在之后的日子里持续了很久，静默、核酸、封校、动态清零、网课、健康宝、新增阳性……那大概是整个世界都在风雨飘摇的日子，但我很幸运地被学校保护得很好，从来没有过对于物资短缺的隐忧。

和孟威老师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她说，希望我能够做一个自在、自由而自律的人，不要把自己套在既定的功利性框架里，能有一种健康、舒展的状态。她说，希望我将来能做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如果“多金”固然好，没有的话也没关系。那时，我还不理解这些话的分量。直到毕业季求职的时候，面对理想职业并不乐观的薪水、北京高昂的生活成本、单程两个多小时的地铁早高峰，才明白践行既有的理念，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我依然还是做了遵从内心的选择，因为我相信心灵的自由远比物质的富足更重要。

三年间，回了两次兰州，见到了石萍老师，她说：“港平会不会也像斯嘉丽回到南方土地汲取力量那样，回到了这里呢？”那天，她本来要留我吃饭，但临时听说我和朋友要去电影院，怕我饿着，给我装了很多零食，说这是黑巧克力，不怕胖；把我送上公车，告诉我在哪站下车，而后目送我离开。拥抱她的时候，我感觉心脏稳稳回到了胸腔。

刚入学那会，我很害怕社交、害怕主动和人说话，害怕亏欠，凡事都希望能够算得“清清楚楚”。这是我成长的“后遗症”，我害怕如果接受了他人的“给予”，总有一天别人会来找我清算往日的对错和付出，指责我“不道德”或者没有满足对方的期待。我害怕内疚和怨怼。隔着三年的光景，我也没有完全克服“社恐”，但至少可以正常地与人交往。自从理解人与人的关系不是一场交易，我觉得世界变得更安全。这样的改变，是我亲爱的朋友、看理想的同事、孙萍老师和我逐渐改变的妈妈带来的。

也是在孙萍老师的影响下，我硕士阶段开始接触女性主义的理论，在面临原生家庭的困境时，会重新审视自己的父母在一段传统婚姻中扮演的角色和各自承受的命运。但是，在这坎坷的命运里，我所看到的是，女性面临的不幸要更沉重些。结婚、生子、离婚、求职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没有适龄婚育，就会被称为“大龄剩女”，面临贬值的“恐慌”；如果没有全然照料好孩子，就是不称职的母亲，不可原谅；一旦发生夫妻矛盾，就会被丈夫质疑“收入微薄”“一无是处”；想要离婚，又不断受到周围人“劝和不劝分”的开导；等到步入不惑之年，终于想清楚婚姻的代价，却还有一个年纪更小的“二孩”需要抚养……

蒋方舟说：“真正触发女性对父权制的厌恶的，并非那个专制的父亲，而是忧愁不决、矛盾纠结的母亲”。母亲是我从小目睹的父权制的受害者，我见过她更年轻时的容颜、乌黑的长发，见过她和我一样从不低头、不服输的个性，却也看到岁月、传统、父权如何以妻职、母职、暴力规训之、摧残之。而如今，我们终于因为“女性”这一共同的身份和可能面临的相似命运达成了初步的和解。

感谢我亲爱的朋友们，安薪伊、樊智宇、李任明杰、赵普庆、苏艳、麦健峰，感谢他们

一直一直陪伴我，从本科到备考再到硕士阶段，从未走散；他们在落魄时收留我，在哭泣时安慰我，在痛苦时开导我，在经济和精神上支持我，一直鼓励我摆脱他人的期待、勇敢地成为自己。求学二十载，以十八岁为分水岭，因为有他们，我得以从昔日的自卑、敏感、忧郁、恐惧中走出来，重新塑造自己。

感谢孟威老师、孙萍老师、石萍老师对这篇文章在选题、结构和细节方面的指导，感谢她们自由、充实、勇敢地生活、求真，以使后来者相信品格的纯粹、精神的强健与爱的力量。感谢我的母亲，她用瘦弱的肩膀扛起生活，却一直保持善良与坚强。愿我们这一代女性，能走出前人未曾走过的道路。